

激进派妇女宣言

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纲要和组织结构

目录

简介---2

梅根·科尼氏 (Megan Cornish)

导言--- 7

我们是谁 8

妇女的先锋角色 9

理论--- 10

压迫的起源 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 12

美国的种族和社会性别 14

改革还是革命 15

女权主义：是阶级斗争还是性别斗争 18

妇女与社会主义 19

建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未来 20

政纲--- 22

法律权利 22

经济平等 23

妇女和工会 24

生理自主权 24

优质医疗保障 25

儿童权利 26

教育 26

政治 27

有色人群、少数民族或种族及土著国家 27

性取向少数派 28

老年妇女 29

年轻女性 30

残障妇女 30

妇女和贫穷 31

狱中妇女 31

卖淫合法化 32

针对女性的暴力 33

环境 33

媒体和文化 34

军队和征兵 35

自卫权 35

反对右翼及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 35

组织结构及原则---36

注释--- 43

联系方式/出处说明---47

简介

当我着笔写这篇介绍的时候，我又回想起九九年世贸组织西雅图会议遇到的令人振奋的群众性挑战。自 20 世纪 60 年代之反越战抗议活动迄今，这样的高潮可谓绝无仅有。反对世界同治的“西雅图之战”的反响远远超越了美国国界，还标志着在年轻人和劳动群体中正演绎着一场风起云涌、活力迸射的骚乱。年轻、激进、紧随政治潮流并投身于改变世界的活动，这一切再次成为时尚！

这新一茬的反抗者和改革者正是《激进派妇女宣言》最直接的听众。他们决意要发起社会革新运动并将它发扬下去，而《宣言》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先进的指导。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激进派妇女组织”（Radical Women, 简称 RW）于 1967 年在西雅图创立，比好多年轻活动家要老。但请注意：贯穿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的政治活动的妇女解放团体虽然为数众多，如自我意识提高团体、乌托邦集体、行动联盟，却惟独激进派妇女组织将女权主义反抗运动的战斗精神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激进派妇女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明显地改变了整个政治局势。

我们何以会有这样的影响呢？凭的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大胆创新、多种族并存、同性恋异性恋共处，倡议把资本主义赶下台去的精神！凭的正是我们所拥护的理论，即阐明战争、环境破坏及一切形式的压迫是私有利润制度的自然产物。还凭着我们组织层面上的民主机构，使我们在紧要关头能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

1972 年，我初次接触激进派妇女组织，当时的《宣言》只有短短两页油印纸，但已涵盖了激进派妇女组织关于妇女受压迫的成因及其解决办法的核心理念。它描述了私有财产增长过程中父权制的起源，还说明妇女解放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得以实现，而社会主义本身只能通过受压迫最深重者的运动才能赢得胜利，其中，妇女、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时，这些想法真是振奋人心、撼天动地---如今它们的威力依然不减当年！

对我来说，第一版《宣言》就如同一条生命线，把我丝丝缕缕的政治觉悟编织在一起。经历了反越战运动后，我成了一名反资本主义者；在反对新左派“兄弟”性别歧视过程中，我成了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一直坚决拥护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种族自由运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 也称黑色美洲豹）、美国印第安人运动，以及联合农场工人联盟（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运动。1969 年，我还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勇气过人的黑人学生发起了一场占楼事件，我和成千上百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表示支持。后来，该活动演变成反对有种族歧视的白人大学兄弟会暴乱分子的武装自卫行动，并最终通过万名学生反对大学行政管理机关的起义形式达到高潮。华盛顿塔科马有一家反战的军人咖啡馆 Shelterhalf，我在那儿工作时，一些同事为自己的性取向苦恼不已，他们不久便加入了西北最早的男同性恋解放论者的行列。我和其他许多人为了这些纷繁复杂的紧急问题马不停蹄地奔波，却苦于找不到妥善的解决办法，以致士气消沉，精疲力竭。

性别、种族、同性恋恐惧症、战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能把所有这些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在遇到激进派妇女组织以前，我闻所未闻。

激进派妇女不是光拿这些议题做纸上文章，他们也同样在街头巷尾撒手大干，幽默大胆，充满热情并颇有成效，此言不虚。我深入实地的回报是得到这样一个人生：它充斥着让我热血沸腾的思想，投身于这个时代全方位的运动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只有激进的行动主义才能带来这样的回报。鉴于此，我热忱地把它推荐给您！

历史和成就

《激进派妇女宣言》包含该组织的政治理论。想必读者也对我们的实践感到好奇吧。本人很乐意带您作一次旋风式旅行，看看激进派妇女本身的历史。请系好您的安全带吧！

创始巾帼

激进派妇女组织在华盛顿西雅图崭露头角，发端于终生共产主义者、民权卫士葛洛丽亚·马丁（Gloria Martin）所设立的关于妇女和社会的“免费大学”课程。因为这门课，马丁与克拉拉·弗雷瑟（Clara Fraser）和梅尔巴·温多费尔（Melba Windoffer）（自由社会主义党的两位创始人）以及苏珊·斯特恩（Susan Stern）（当地“民主社会学生”组织中的著名人物）开始合作，创立了激进派妇女组织。马丁在其所著的《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第一个十年：1966-1976》一书中写道：成立新小组旨在“表明妇女能有政治作为，能学习并教授理论，能管理组织机构，能发展自身领导阶层，能把运动和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到完全被忽视的妇女权利问题上来 --- 而且妇女能靠一己之力做到。”

激进派妇女组织独树一帜的是：把“新左派”学生活动家和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老左派”女权主义激进派人士融合在一起。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左派”起源于反越战运动，总体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颇为避讳，扬言“任何 30 岁以上人的都不可信。”苏珊·斯特恩很快离开激进派妇女组织，加入秘密的“地下气象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新左派中产阶级组织，认为可以通过个体恐怖行为带来变革）。但 51 岁的马丁和 44 岁的弗雷瑟成了被 RW 吸引的年轻女权主义者们的楷模和良师。早在圣路易时，风华正茂的马丁便勇敢地参加了早期反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弗雷瑟身为激进的俄籍犹太移民后裔，20 岁出头便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她俩兼独立职业女性、工会会员和母亲于一身，充满自信、凡事质疑、离经叛道、不吝批判却富人情味，诲人不倦而不失诙谐。她们对辩论来者不拒，并精通所有国家的文艺、音乐和文化。有良师诤友如斯，吾辈幸甚至哉！

一开始，一些持各种左派观点的人都参加了激进派妇女，但除了自由社会主义党（FSP），其他人的热情都很快消失殆尽。长期的合作关系，以及我们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活动的同时进展，促使 RW 和 FSP 在 1973 年达成了正式联盟（自由社会主义党比激进派妇女组织早一年成立。强调妇女解放是它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分裂出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激进派妇女组织与自由社会主义党的联系，对其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幸存下来起到了一定作用。它还帮助我们形成了一股全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党派每在一地建立分支，其中的女性成员就会同时成立一个激进派妇女小分队。激进派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认识到，与自由社会主义党的联盟不但没有削弱我们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反而给我们提供了意识形态避风港和组织支持，使我们得以‘畅所欲言，为所欲为’。

坚定的反战立场

从一开始，激进派妇女组织就深入参与激烈的反越战动员活动。她们首次在游击队剧院闪亮登场。第一次参加抗议，激进派妇女组织代表团穿着女越共服装上场，身上还佩着枪！

当时有许多男性活动家认为，既然妇女不能入伍，那么她们在运动中就无一席之地（除了处理办公琐碎事务、或是用来提供家务/性服务之外）。针对这种偏见，激进派妇女据理力争：我们不但反对征兵，还反对把妇女排除在征兵对象之外的性别歧视。我们申明，如果征兵，“第二性”将成为最强硬的反抗者。此外，我们的成员还将矛头直接指向美军士兵，揭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对女性施暴的宣扬是军事教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迫切希望，大家会采取一种把各种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的立场，而不是眼下盛行的立场，即把问题孤立开来，使提出的要求显得片面狭隘而无足轻重。我们所做的，远不止机会主义者所喊出的“立即撤出”口号，而是要立场鲜明地为北越南社会主义军队的胜利摇旗呐喊。我们联合起来，为民主而战，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而战，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妇女也是战争主要受害者而战，为了结束对民主党的盲从而战。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伊始，激进派妇女组织始终如一地抵制帝国主义战争，并将因现实所迫而永不止息。凡为了争得利益和统治阶级的控制权而侵犯男女劳动者的生命和自由，比如由美国/联合国/北约鼓动发起的对智利、尼加拉瓜、伊朗、格林纳达、巴拿马、索马里、伊拉克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干涉、冲突和战争，我们都予以公开谴责。

多姿多彩的工人阶级的女权主义

1969 年，激进派妇女成员曾和反贫困运动的美国黑人妇女合作，在华盛顿州发起堕胎运动，在国会大厦举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游行。运动目的是为了争取自由堕胎权，反对让有色人种妇女接受强迫性绝育，并要求获得财力范围内的、24 小时高质量幼托服务。我们力争性服务行业合法化和无过错离婚，把那些说教者震慑得魂不附体。警方对强奸和袭击受害者麻木不仁，我们与之作斗争，要求政府颁布《西雅图城市法令》，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

1972 年，曾几次三番代表自己出庭的克拉拉·弗雷瑟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一门划时代的课程，教育妇女如何用法律武器进行自卫。在那个年代，这门课关乎妇女的生存，因为妇女在离婚和孩子监护权审理中往往被剥夺一切权利，甚至找不到辩护律师。

RW 一贯敦促达成联盟和统一战线，包括行动幼托联盟、女权主义统筹委员会（注：一个由西雅图各阶层的妇女团体组成的庞大组织），还有保护立法联盟（注：此举是继《华盛顿州平等权利修订案》通过之后劳工和女权主义者之所为，为的是把女性规定的安全工作措施适用于男性）。

我们深知，女性处于被征服地位应归咎于财产制度，而非男性本身，所以我们排斥那种因动辄攻击男性而著称的激进女权主义，它使不少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妇女与我们疏远。有个晚上，我们的会议厅被离间分子用喷漆涂上了奚落言辞，如“激进派妇女造就男人”等等，原

因正出于此。但我们从不后悔自己选择了政治原则，而不是一时的受欢迎。

从一开始，RW 就把自己与自由主义的“游说议员的女士”区分开来。国家妇女组织等团体的头领想方设法让女权主义运动别“太张扬”，但 RW 有自己的观点：攫取“名望”是一条失败的策略，而且只会出卖社会上苦难最深重的妇女。

多亏克拉拉·弗雷瑟的远见卓识和及时干预，我们才躲过了运动中另一致命的弊病，即目无领袖的心态。在一次反战会议上，克拉拉遭到了敌对派猛烈的言语攻击，我们那批年轻成员却没能为她挺身而出。克拉拉认识到，他们该学习“战斗于最前线”到底意味着什么了。她推动 RW 新姐妹承担更多责任，同时赋予她们更多权力。后来，RW 采用了她的文章《妇女作为领导》和《致 <关于领导的说法>》，表明组织的立场。

通过对抗猖獗的性别歧视、新左派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以及虚构的女性弱点心理，激进派妇女姐妹们意识到妇女有着天然的领导才能，而这种才能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种族解放主义者

把追求种族自由和性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一直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特点。RW 向来支持有色妇女的第一线角色；支持与女权主义活动家中的种族主义作斗争；并支持在有色人种运动中大胆抗议性别歧视。对于和我们一样敢于抗争的人，我们表示嘉许。比如，在 RW 成立早期，当时的民权组织者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发表了赞同妇女平等的突破性讲话。为此，RW 给他寄去了一打红玫瑰。

我们致力于为有色人种妇女利益代言的女权主义。在是否该共同主办由“黑豹”领导的反警察暴行集会一事上，RW 发生了争执，接着出现了使组织特征明确化的第一次分裂。有几名 RW 成员称此事“与妇女解放毫无关系，”随之气咻咻地退出，但我们的宗旨却因此变得更加不可动摇。

摆脱羁绊之后，RW 开始协助保护当地黑豹党，使它们不像其他城市的党内好战分子一样被警察杀戮，遭受致命的打击。有一天，警察开始在党总部门前纠集，我们启动电话网络，发动了社区防御护卫队。RW 和我们的支持者们围成一堵人墙，阻止警察进入大楼。一场可能来临的攻击终告失败。

为了打破楼盘交易白人一统天下的种族界线，联合建筑工人协会（UCWA）组织了大规模的市民对抗运动，我是几个在建筑工地被捕的 RW 成员之一。我们呼吁 UCWA（其成员多为黑人男性）推行女性参与贸易，虽然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最终还是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罗萨·莫拉莱斯(Rosa Morales)是位勇敢的奇卡诺（注：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或在美国的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后裔）女权主义者，原在华盛顿大学奇卡诺文化研究所任职，作为性别歧视的牺牲品而被开除。我们在联合抵抗中功不可没。我们动员美国本土印第安人争取主权，还参加了普亚勒普部落对卡斯卡底古陆青年中心，原印第安一家医院的成功接管行动。东起纽约西至洛杉矶，我们要求对移民实行赞助行动，进行种族研究，给予公平对待，并要求终止警方暴力。

1981 年，全国有色人种核心小组成立，这是我们内部尤为为重要的一项发展。该独特团体的有色成员既有来自激进派妇女组织的，也有来自自由社会主义党的，旨在提高黑人、亚洲人/太平洋各岛民、拉丁美洲人、土著人的自信心、技能和社会能见度，并就有色人种重要事宜为 RW 和 FSP 提供指导。该核心小组会议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可用以讨论和克服组织内部会冒出来的无意识种族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非常重视有色人种的领导和斗争，这个核心小组会议证明了这个重要性，更多的有色妇女受到鼓励而参加了 RW，甚至在其中几个分支中占据多数。

“薰衣草”力量（同性恋政治经济力量）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男同性恋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RW 对这一重要政治运动表示了热烈的拥护。我们的女同性恋成员们开始埋头苦干，分析了对同性恋的憎恶和迫害与性别压迫及阶级剥削之间的联系，从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了使一项给性取向少数派提供就业和住房保障的《西雅图城市法令》得以实施，RW 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协助建立富有战斗精神的男女同性恋权利组织，与无数联盟携手禁止强制性艾滋病检查，阻止用投票形式作为武器侵犯同性恋权利，要求国会通过赋予男同性恋权利的州议案。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20 世纪 80 年代，RW 里有个姊妹叫默尔·伍(Merle Woo)，她是一名很受欢迎的大学讲师、著名作家和一个敢作敢为的亚裔美国女同性恋代言人。在两起大规模劳工案中，她控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种族、性别、性取向和政治意识形态诸方面存在歧视，最终都以胜诉告终。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运动向来是一项极为蓬勃活跃的社会斗争，RW 为自己是其中一员而引以为豪。

走向无产阶级

1974 年，RW 意识到我们赢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即从一个以学生为主的团体变成了一个以羽翼丰满的工作人员为主的组织。在华盛顿大学，我们帮助组织了一次罢工，组建了一个低收入劳工联合会（主要包括妇女和有色人种），藉此招纳了一批在职妇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个观念，即后来著名的“可比价值。”它比“同工同酬”的概念更胜一筹，强调建立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不同工作的“价值”，使可比性工作获得同样报酬。

同时，纠正歧视措施给 RW 许多成员提供了开拓非传统行业的机会。在西雅图的公共电力公司城市之光（City Light），克拉拉·弗雷瑟制定并实施了开国内先河的培训计划，培养妇女担任公用事业电工。该项目非常成功，笔者就是十位得到鼓励的电力行业培训人员（ETTs）之一。但是，由于捍卫 ETT 项目不受到管理层的破坏，并在一次大规模公用事业罢工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克拉拉被解雇了。她马不停蹄地进行了长达七年的诉讼，最终赢得了工作场所的言论自由权，并得以在“城市之光”官复原职。

在工作场所，RW 成员自然而然地成了联盟战斗者，有些人则多年来都在旧金山和西雅图县劳工委员会中作为表率。20 世纪 90 年代，让诸联盟加入反击重新抬头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成了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关于大批妇女进入工会的重要意义，我们在理论上的理解也得到了深化。不仅是我们的队伍变得壮大，我们的人员也被战略性地部署在飞速发展壮大的服务部门。妇女与有色人种、男女同性恋者一道，组成了劳动主力军。简而言之，我们改革社会的潜力超前强大。

世界乃是我们的领域

姐妹遍全球，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更毋庸置疑。激进派妇女组织已经扩展到了澳大利亚，我们的国际干预范围也有所增加。

1993 年，我们的华盛顿、西雅图和俄勒冈州波特兰支部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和东欧，考察苏联解体对妇女、劳动者、国内少数民族和同性恋群体产生的影响。她们遇到的人大体上都对日暮西山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作风深恶痛绝，同时又对恢复资本主义持非常怀疑的态度。RW 式的民主的、女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赢得了真正的关注。

RW 还不遗余力地帮助古巴维持其工人国家性质。另外，我们和古巴妇女联盟建立了特殊的团结关系。1997 年，RW 和古巴妇联合作，向古巴派出了有史以来第一支国际女权主义团队。该团队呼吁全球保护古巴岛，加大了反对美国不道德封锁的力度，并宣传了古巴革命带给妇女、儿童和有色人种的鼓舞人心的益处。

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激进派妇女组织给女权运动带来了理想、战斗力和合作精神。我们的影响力大大超越了自身范围。RW 使公众的言论整体上倾向于左派，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上最受排斥、最受侵犯人群的需求上。这样一来，我们的组织扩大了女权主义者、劳工、有色人种、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斗争的力度和成效。

我爱上激进派妇女组织，是因为它的热情，它的胆略，它的想象力，它的才智和它的原则性。时至今日，这些品质仍像我刚加入那天一样清新。看一看我们的《宣言》吧，如果你对所看到的内容感兴趣，就请你和我们一道进行伟大的探索，共同创造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未来吧！

梅根·科尼氏 (Megan Cornish)

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导言

时至今日，全世界的妇女仍处于二等公民地位，无异于现代女权运动诞生前的 20 世纪 50 年代。

历史已经证明，国际资本主义不能为妇女提供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相反，为了自身经济上的生存，这种制度越来越依赖于对妇女的剥削。

如今的妇女仍然在工作、职业、教育、法律地位、社会自由、政治生活和家庭/性角色等方面备受歧视。性别和性特征使我们成为压迫对象；作为劳动者，我们饱受剥削；身为有色人种劳动者，我们更受到变本加厉的压迫。尽管经历了多年大规模的国际妇女运动，这种被压迫现象在今天却日益严重！走投无路的资本主义甚至会不惜粉碎一切公民自由，借助妇女权利的终极破坏者，即法西斯主义，来维护其利益。

我们是谁

激进派妇女组织为国际性组织，于 1967 年成立于美国，是美国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女权团体。我们当中有有色妇女、犹太人、白人、劳动者、学生、同性恋者、女异性恋者、老人和青年。

激进派妇女致力于揭露、抵制和消除妇女生存中的不公平现象。为了履行保障全体女性的生存的任务，我们必须同时针对性别歧视的社会和物质根源，即以内在阶级、种族、性别、民族和等级压迫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形式。为了让人人都能享有完全的人道主义权利，脱离贫穷、战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反同性恋、反犹太主义和镇压，我们致力于实现把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我们深信，妇女解放与反对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严重不公不义作斗争息息相关。在每个被剥削的社会阶层中，我们至少占一半人口；每次追求自由的斗争也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都有着受各种压迫的人生经历以及受压迫的共同起源，即资本对利润的贪得无厌的追逐。因此，我们不能将斗争孤立起来搞单项运动，忽略妇女受压迫的各方面现实。所有被压迫群体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能把分散运动集中起来的运动。团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

激进派妇女组织深信，妇女受压迫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头等大事。妇女的政治领导地位对一切分散运动的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我们注定要在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全面运动中扮演先锋角色。

我们深信，任何一个群体要获得真正的解放，所有被压迫群体之间必须团结和互助：要么大家都自由，要么没人能自由。要把我们从集体受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包括有色人种、土著民族和少数民族的解放斗士、工人阶级、青少年抵抗力量、妇女运动成员、性少数派、囚犯、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所有被资本主义蹂躏的人必须团结一致。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也不会默许任何藏在伪装下的男性沙文主义，如那些否认或姑息女工遭受特殊剥削的事实，以及忽视妇女作为一个性别整体所受到的不寻常压迫的、名不符实的“阶级团结”、“种族团结”或者“和平运动团结”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团结”。

无视社会经历和压迫程度差异的“团结”，是眼高手低、似是而非的团结，最终会拆自己的台。以“最小公分母”（即最少的共同点）为基础的“团结”加深了特权阶层和无特权阶层之间的区别，强调了较幸运阶层的利益，却牺牲了最受剥削阶层的更大需要。

以我们的牺牲为代价的“团结”仅仅贴上了抬高我们身价的虚伪标签，实则强化了妇女的附属地位。

妇女的先锋角色

作为政治激进派，我们期待并致力于一个革命的新世界，一个重生的自由世界。

作为妇女，我们期待并致力于一个以平等、互重为基础的创历史新高的人际关系。

作为激进派妇女，我们理解并传播一个理念，即“在开展的国际革命运动中，妇女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对妇女的剥削使全体女性成了备受压迫的性别，她们的反抗潜力和领导能力将无人能及。

目前，妇女运动的主流领导者多半是职业中产阶级白人，但该运动本身却是由激进分子创立的，如今，左翼领导力量正日益壮大，她们来自于广大工人阶层中的富有战斗精神的妇女，尤其是有色妇女与女同性恋者。

这些妇女受到双重甚至三重剥削：工作中，每天与老板发生正面冲突；生活中，几乎在每一层面上都与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主义者发生冲突。因此，对于压迫的三重本质，即阶级、种族和性别，她们比大多数不工作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有更深刻的意识，更清醒的觉悟。

日常生活中的艰苦生存斗争赋予有色妇女、女性劳动者、女同性恋者重视纪律和理论的品质，因为对贫困妇女、职业母亲以及独立女性来说，生活有赖于头脑清醒、自我约束和办事有条理。相应地，她们要求任何自称是成熟的、现实的运动也具备这些特点，无法接受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装腔作势、榨取他人利益、利己主义的人。她们要消灭资本主义，结果会有百得而无一失。她们变得激进而声势夺人，这不仅是一种理智的选择，更是因为在生活中有作为受害者的体验。她们要向资产阶级制高点发起进攻，并进而代表所有被羞辱和遗弃的人夺取权力，自身的经历对这样的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这些妇女，这些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参加任何团体，但一旦决定致力于某事，就准备全身心投入的妇女，注定会成为整个运动的领导人。该运动的历史责任就是与这些妇女建立一种意识上的纽带。在充斥着各种零工和工人阶级/有色人种社会的现实中，妇女必须共同斗争，在战斗过程中体验到团结精神和同志情谊，这种纽带关系历来存在。

我们为妇女解放而进行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为了摆脱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必须要进行变革，而变革意味着斗争时间要延长，意味着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努力都将招致强烈的对抗和顽固的阻力。这股阻力是双重的：有来自外在的敌人，也有来自充满自我矛盾的运动内部。

激进派妇女深知，妇女运动会有起起伏伏。只有充分掌握了历史、社会理论和经过检验的组织原则，才能为经受前进道路上的狂风暴雨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杂乱无章而败坏堕落的社会环境中，《激进派妇女宣言》是我们把持自己的指南，一个牢牢根植于妇女的历史，即女性性别受压迫之开端的指南。

理论

说到妇女的历史，我们从小被灌输以圈套式的谎言和真假掺半的说法。人们教育我们，女性天生低人一截，庸碌无能，属于二等公民；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我们只是被动的旁观者，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只有了解了我们真实的历史，以及我们是如何被迫沦为从属地位的，我们才能知道争取自由的斗争该从哪里着手。

压迫的起源

论及该如何解释妇女受压迫的起源，激进派妇女认同卡尔·马克思的同仁、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人类学证据、历史的观点、以及有关社会经济学的分析。在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¹（以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对美国土著社会的开拓性研究²为基础）一书中，他表明人类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区分先发生在男女之间。这一古老的划分源自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以及母系制变为父权制。在我们看来，这是对妇女本身历史的最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解释。

恩格斯并没有把两性之间的斗争归咎于任何个性别与生俱来的罪恶，而是归之为技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和家庭结构的巨变。这种分析方法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和马克思认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历史的、短暂的、而非生物学的、文化的、心理学上的必然结果。家庭的形式最终由经济和财产关系决定。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演变，家庭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恩格斯表明，有没有劳动能力是区分动物和人类的最初标准。20世纪有一位社会学家、女权主义者、人类学家艾弗林·利德(Evelyn Reed)，她以恩格斯的著作为基础，写了《妇女的进化》一书。在书中，她阐明了在人类诞生过程中妇女的角色。利德写道，“社会劳动是区分人类和动物的根本特征。最初主要由妇女掌权……妇女的劳动具有崇高的创造性：它创造了人类生命本身。”³人类社会以母亲和孩子之间一种保护性的生物关系开篇，然后发展成以劳动合作为基础的、各个母亲之间的保护性社会关系。

妇女的社会地位直接根源于我们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而非我们的生物属性。在原始社会，妇女在社会生产中扮演了和男性同等重要的角色，因此也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持部落的生存，人人都需要劳动。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每个人的贡献都是有价值的。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很盛行，但每个群体享有同等的声望。阶级差别并不存在。妇女负责管理部落的营地。在集体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她们是文明的创造者和承载者。她们发明了医学、农学、建筑学，创造了第一首诗，建立了第一个政府（管理机构）。男人则通常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狩猎、捕鱼或放牧。

利德解释道：“正是借助妇女所取得的技术进步，男人最终从对狩猎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进入更高形式的劳动。”⁴在妇女的教导下，男人学会了耕种技术和其他许多手艺。

家系和私有财产都依据母系传承下来。部落成员中盛行绝对的民主和平等决策。每个部落都

由不同的核心团体或氏族按照母系方式组成，也就是说，亲属关系取决于与母亲、姐妹的亲密度。这种公社女性亲属群体霸权（对这一点颇有争议）就是母权制，是人类稳定的社会组织的开端。它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大量人类学证据的证实，包括人工制品、古代艺术和文学、神话的发展，还有，在某些部落里，至今留有以母权为基础的血缘关系体系的痕迹。

母权制是我们平等人际关系的最高模式；妇女是受人敬仰的领袖，子女由集体抚养，包括同性恋的性自由现象十分普遍。

妇女的权力来源于最初基于性别的劳动分工。但是，随着驯养牛群带来的过剩现象，劳动分工引发了冲突，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畜群由男性照看，因而由男性拥有。随着畜群的数量增多，男性最终生产出多于部落生存所需的剩余畜产品。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被取而代之以为了货币而进行的产品交换。畜群流动性强，可以用来交换，成了最初的货币商品。通过积累这种货币商品，男性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个人私有财产。

财富差别使得男性在部落和公社家庭中变得比女性更强大，但他们仍然不能把自己的新财富传给自己的后代。在母权家庭制度下，他们的财产传给了姐妹和姐妹的子女。男性想把财产转移给自己的子女。在这一念头的驱动下，他们推翻了传统的母系遗产继承规则。此外，为使继承“万无一失”，他们还要保障孩子确系己出。在恩格斯描述为“女性的世界性的历史挫败”⁵的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中，男性实现了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夺取了权力。

原始共产主义被私有财产代替，母权被父权推翻。一种无情的机制，即单一配偶家庭单元开始出现，通过强制妻子的性忠诚来巩固私有财产制度。于是，一个残忍的控制体系被强加在妇女身上，并随着作为至高压制权威的政府的建立而被确认下来。

妇女地位随着新的经济劣势和依赖性不断下降。她们和驯养的家畜、奴隶和孩子一样，沦为男人的财产。她们被私有化，丧失了公民权利，成为家务劳动、繁衍后代和性的工具。以保护新统治阶级富有男性的利益为目的的国家出现了，对妻子强制实施的单配偶制很快被编入法典。丈夫被赋予生杀大权。单配偶制的必然结果是，卖淫和通奸等现象到处蔓延。不久，妇女在市场上被买卖或交换。

在原始社会，公社/集体家庭和社区实为一物。但是，随着私有财产战胜公有财产，物品的生产分成了两类：供应市场的物品的社会生产和供应父权制家庭的个人的、私有的家庭劳动，后者由妇女无偿提供。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二元对立是男女冲突的真正经济要素。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加上对女性单配偶制和家政乐趣的蓄意推销，大大加剧了劳动的公私矛盾。弗洛伊德学说被系统化为讳莫如深的“生物决定论”，为性交易提供了伪科学的保护伞。妇女在成长过程中被拒绝、被歪曲、被扰乱，被文化塑造成神经兮兮而单调乏味的角色。

恩格斯提到：“劳动发展水平越低……社会财富也越有限，社会秩序就越发会受亲属群体操纵。”。母权制下生产力飞速发展，财富和阶级应运而生，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基于亲属群体的旧社会被分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国家为控制中心的新社会……社会中的家庭制度完全由财产制度决定，从此，阶级对抗、阶级斗争成了人类史册的全部内容。⁷

在悠远的时间长河里，核心家庭、私有财产、国家等相对来说都是新兴事物。但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恩格斯就下了结论：

我们正迅速走向生产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并且成了生产的必然阻力。它们的灭亡，如同他们的兴起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⁸

有人批判恩格斯狭隘，说他支持的观点只适用于西欧白人。这种说法与事实背道而驰。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涵盖了从史前到有历史记载以来全球范围内人类发展的普遍轮廓。他的著作中关于非洲、亚洲、美洲的例子比比皆是，他的方法论核心恰恰是他的国际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者们分析人类历史时，深知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差别不是出于“天然，”也并非基于科学，而是为了满足特定的技术、经济，即“生产方式”的需要而衍变出来的社会类型。这种基本经济规律作用于所有国家。

把种族进行分类是极不科学的，因为生物学上截然不同的人种根本不存在。然而，种族歧视的存在却千真万确，它的形成是为了给盘剥有色劳动者提供合理性。

在有些国家，家庭形式与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同，或者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本质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原因就是那里的生产结构和财富分配不同。在殖民地国家，在美国印第安人当中，或者在其他任何公有制和集体化社会依然存在的地方，母权制家庭关系和民主决策仍显而易见。当然，其中存在着多样性，这要取决于殖民势力将其习惯和制度国际资本主义化的程度。

事实上，“非洲社会主义”、“美国印第安人公社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模式。现代社会主义把原始共产主义的自由、友情、平等和先进的科技和谐地结合了起来。自古以来，正是这些私有制社会以前的有色妇女表现出妇女自尊、高尚的地位，即我们的本来面貌。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

在父权制统治下，妇女的低下地位被强化。恩格斯称，从那时起，妇女的屈从情况“被逐渐加以缓和并掩饰起来。有时掩饰得淡一些，但妇女的屈从地位绝没有被废止。”⁹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出现，恩格斯所描述的性别歧视问题变得更加尖锐，继而随着帝国主义支配全世界而达到极致。资本主义出于对利润的迫切需求，总体上完全控制了家庭和人事关系制度，使阶级、性和种族歧视进入了一个最广泛、最复杂、最牢不可破的发展阶段。

自从希腊父权社会单配偶制实施以来，资本主义的婚姻和家庭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私人家族的分崩离析和女性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劣等地位的强化却变得更加复杂。婚姻仍然是一种控制金钱关系和巩固父权制的契约。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家庭内部，[丈夫]是资产阶级，而妻子代表了无产阶级。”¹⁰

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确实让妇女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妇女重新登上了社会有偿商品生产的舞台。19世纪，妇女和童工的出现引起妇女经济地位的莫大变化。然而，这个革命性变化却被制度吞没，适得其反地被服务于父权制私有财产和国家。少数妇女实现了经济独立，还有不少妇女在习惯和态度上有了自我解放。但是大多数劳动妇女发现，她们的劳动

技术和提升机会注定将一如既往地繁衍、性服务、和私人家务劳动这些角色拖累。妇女重新进入社会生产，结果只不过是劳动量增加一倍，在工作前线重复着在家里所受到的歧视。

妇女传统无偿劳动被用以说明妇女工资低、从事次要的服务性工作的原因，比如当女仆、女侍者、洗衣工、秘书、制衣工人、护士和妓女。妻子的赚钱能力不如丈夫，因此常常需要一边工作一边料理家庭、照顾孩子。所以，即便存在形式上的法律和经济平等，恩格斯认为，“现代个体家庭建立在对妻子的公开或隐蔽的内部奴役上，现代社会就由这些家庭单元组合而成。”¹¹

毫无疑问，资本家享有两个世界的最大好处。在家里，妇女发挥着传统的作用，养儿育女，打扫卫生，做饭洗衣，随伺左右、打点丈夫的午饭，好让他能日复一日地赚取工资。在不~~对制度造成任何损害~~的前提下，妻子的劳动被榨取了。而且，正~~因为~~妇女进行大量无偿家务劳动，她们被当成奴隶或廉价劳动力，作为社会生产工人时也同样遭到剥削，得不到应得的工资。

很显然，如果缺少父权制核心家庭组织，资本主义制度便无法运转。对资本主义而言，要是公平支付妇女的家务劳动，补偿其从事公共产业的过低工资，就无利润可言了。

不过，当代家庭正在走向瓦解。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婚姻都以离婚告终。数以百万计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收入水平最低的工人中，数量日益增长的单身母亲不得不独自承担责任，抚养社会儿童。核心家庭的瓦解经常被归咎于“不负责任的女人”（如果母亲是有色人种更难辞其咎）或叛逆少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真正的原因，即这个现象的~~物质~~根源，是凌驾于人类需要之上、占据统治地位的财产关系，是这种关系导致家庭内部产生极权主义权力关系。

核心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高度发达的阶级结构的组成细胞：不管是否显而易见，男人就是女人的上司，而父母一起控制孩子。所有人被迫住在一起，这样才能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和转移财产，统治阶级才能繁衍现在以及将来的劳动者，并由妇女无偿养育和照顾。

和社会生产的大舞台一样，阶级斗争也注定会在家庭内部生活中爆发。家庭中被压迫成员变得越来越疏远而充满敌意，最终在爆发之后拂袖而去。在某种程度上，青少年叛逆、性革命、女权主义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运动都是家庭瓦解和寻求核心家庭替代品的斗争的产物。

当代核心家庭不仅保守倒退、有失公平、生硬做作，而且违反社会秩序或生活方式。它把妇女与社区隔离，也使她们互相疏远。作为~~个~~人的独立组织，它滋生了反社会的个人主义，阻碍父母和孩子参与公共事务。家庭是多数人的首要支柱，尤其是在被压迫人群中，但家庭却总是让他们失望。家庭暴力、对孩子的生理虐待和性虐待更是父权制家庭的令人寒心的传统。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家庭一直不像中产阶级家庭那样一成不变。总体上，工人阶级和穷人群体没有巨大的财富积累，因此不存在实行继承法的物质基础。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妇女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外出工作，届时，男性的霸权便趋向消亡。一个能自立的女性在性伙伴和生活方式上的选择度要大得多。

如今，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核心家庭在现实中越来越失势。比如在美国，只有 9.4% 的多人口家庭依然遵循传统的父主外、母主内的模式。¹² 恩格斯早已预见无产阶级中核心家庭的瓦解。他提到，“既然大规模的行业把妻子从家里带到劳力市场上和工厂里，让她常常成为养家糊口的人，也许，除了单配偶制实行后蔓延开来的对妇女的蛮横行为之外¹³，无产阶级家庭中已不复存在任何形式的男性霸权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补充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旧式家庭关系的解体显得多么可怕，多么可恶，现代工业在家庭之外赋予妇女、年轻人、男童女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从而为建立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基础……另外，劳动群体由各年龄段男女组成，这事实本身是导致腐败和奴隶制的一个害人的根源，它以自发形成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形式出现，劳工为生产过程而存在而非生产过程为劳工而存在¹⁴。虽然如此，这事实适当条件下势必会成为发扬人道的一个源头，这一点毋庸置疑。

恩格斯把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归纳如下：

要想完全了解现代家庭中夫尊妻卑的奇怪特征，明白在他们之间创造真正的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及其方法，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完全平等的法律权利。然后，要让妻子获得解放，其首要条件显然是把女性整体带回到公共产业中来，这就反过来要求废除单配偶制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元的特点。¹⁵

资本主义会破坏核心家庭，却又无法接受它的毁灭。只要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依然存在，那么所有社会机构便会继续作用于个人关系，迫使它们陷入逐步四分五裂的单配偶制家庭模式。只有当性伙伴和生活环境的选择可以不受任何经济因素的胁迫，资本主义及其所有经济和社会羁绊也被去除之后，人类关系的彻底自由才能得以实现。

美国的种族和社会性别

通过实行帝国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使得妇女受压迫状况国际化。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人道和经济独裁之间的矛盾那么尖锐，因为那里的资本主义拥有最先进的科技，最依赖于妇女和有色人种的廉价劳动来维持利润。

通过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联合方式，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征服妇女是美国发展私有财产制度、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以至帝国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样，残杀印第安人、设立黑奴制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在占地敛财，积聚技术和生产力方面在全球独占鳌头所必不可少的。同样遭受剥削的还有亚裔、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在美国生活的墨西哥人，他们充当建设西部和西南部的廉价劳动力，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

奴隶制和单配偶制家庭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经济机构，在成为生产和工业发展的阻力之前一直占据优势地位。假如没有那长达两个世纪的合法奴隶制，没有对解放后的美国黑人的百年剥削，也没有对妇女劳动的日益扩大的巧取豪夺，美国绝不可能取得霸权地位。我们切不可忘记，被诱拐或掠夺来的奴隶来自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与大部分非洲社会，它们原系部落制或联合制母系国家，其社会结构是公有制。在美国白人（不论是北佬还是南方人）贪婪地追逐土地、廉价劳动力和利润的过程中，被践踏遭殃的正是这种传统。

美国黑人家庭被弄得支离破碎，美国印第安土著家庭则受性病和酒精的毒害。这两个民族的妇女受到系统性的贬损、压制，乃至沦为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贱民，做社会下层群体中的垫

底。对整个民族有计划的屠杀、对女性唯利是图的虐待，构成了美国“文明”的真实内容。

为了巩固利润，资本主义创造了许多其他形式的歧视。年龄成了支付低工资或者干脆把人抛出劳动大军的借口。只有不到一半的残疾人有工作，工资经常低于法定最低工资，尽管大多数人是因为工作环境不安全、贫困或者帝国主义战争而致残。男女同性恋者和变性者在招工、报酬、晋升、救济方面遭到歧视，而且被某些行业列入拒招黑名单。

有色人种、妇女、女同性恋、男同性恋、残疾人、年老者 and 年少者构成了廉价劳动力大军，一个随经济需要而被随时引入或挤出劳动市场的劳动力预备大军。这一现象使少数白人获得超利润成为可能。对于有色妇女来说，这意味着作为工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的三重剥削。

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奴隶制传统衍生了有关有色人种和妇女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被用以表明我们二等公民地位的“合理性”。我们的形象是：依赖性很强，没有理性思考能力，惯于偷鸡摸狗，过于情绪化或不近人情，幼稚无知，莫名其妙地知足，毫无改变命运的雄心壮志。而有色妇女再次被沦为双重牺牲品：因为她们既是少数民族又是妇女，这两重身份都被用以说明其生物劣势。有色妇女在与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美国的各种联系中，遭受着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奴役。

在对利润贪得无厌的追逐中，美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它所塑造的刻板印象把妇女贬低和非人化，而且得寸进尺地通过这些刻板印象本身牟利。为了出售一切物品，小到牙膏大到电脑，利用女性的身体已是商业老手段。把妇女作为性对象的普遍做法不仅强化了白人妇女娇揉造作、索然无味、妖娆诱人的形象，而且创造了一个明显虚假的美的标准，更深地侮辱了其他民族女性。女同性恋者被歪曲成性失意的、病态的、对男性满腹怨恨的形象，用以分裂女权主义运动。娱乐业塑造出史太萍·菲池 (Stepin Fetchit)¹⁶之类的美国黑人形象，使种族歧视变本加厉，让黑人和白人无法齐心协力来对付共同的剥削者。

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种族和性别歧视破坏了工人阶级反对工资剥削的斗争，它们除了鼓动人们对每况愈下的工作和地位进行不断的角逐之外，还助长了内部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此外，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行为分裂了民族自由运动，妇女运动中也有些成员纵容种族主义态度，甚至在对待女同性恋和妇女领袖的态度上也留有性别歧视的痕迹。

但是，工人阶级的这些严重分歧是可以弥合的。女工们，尤其是有色妇女工人，把性意识、种族意识和一般的劳动问题联系起来，建立了工人之间的动态的、战斗的联盟。正如我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预见的那样，今天，多样化政治已被广泛接受，在改造社会的一切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有色妇女、女同性恋以及女工正进入领导层。

讲原则的多样化联盟才是强大的。只有深刻领会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事实，才能有办法维持团结和胜利。我们独特的社会经济地位，赋予了女工充当创立团结的先锋的任务。我们将继续一马当先，一则因为我们义不容辞，二则因为作为来自不同种族、有不同性取向的女性，要生存下去，没人比我们更需要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改革还是革命

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和程度暗含着我们的出路。我们包揽了被征服的命运彩票。在长期受压迫

的人类群体当中，我们受到的压迫是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最具国际色彩的。只有一场广泛而空前的革命性社会剧变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男权至上的制度，恢复经济地位平等，进而开始重新勾勒出长达五千年的歪曲和反革命之后的性政治的轮廓。

性别歧视不仅是资本主义肢体内滋生的毒瘤，也可谓是其肢体本身，因为肢体的定义、动力和能量都来源于它。性别歧视的根源和舞台，以及对它的绵绵不断的需求都限于资本主义范围内。女权主义革命者的任务是把性别歧视的老窝，即私有财产制度，变成与其对立的唯一大敌，即社会主义，并将性别歧视送入坟墓。男权至上的资产阶级元老必须被赶下台，取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经济的母权制民主和人道文化。

有色人种受剥削是资本主义另一核心特征，对他们而言，推翻利润体系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对于各种族和有各种性倾向的妇女而言，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是确凿无疑的。压迫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有财产的开端，以及私人无偿家庭劳动和社会有偿劳动之间意义深刻的划分。因此，要获得妇女的真正平等，不仅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财产制度，而且要求相应地根除一个使压迫永久化的机制，即国家强制实施的资产阶级单配偶制家庭。

若要赢得自由，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公有的、民主的合作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品和劳务会重新被公有化，也就是说，由大家共同生产和占有，并根据人类共同需要而非个人利润进行分配。工厂和产品的私有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权力必须被废除。届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荒谬冲突会遁于无形，因为这两者将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各种族的男儿童将在成长过程中共享地球和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不再有贫穷、战争、剥削、残暴和镇压。

这个世界有一个名字，叫社会主义！它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才能巩固这种全球性胜利。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和庞大的科技力量，要长久维持世界其它地区的根本性变革，关键在于发生在美国的革命。

实际上，美资本主义是国际性的。它的触角遍及全球，窃取土地，掠夺资源，压榨妇女和第三世界人民。因此，在“野兽腹地”发起的革命决定着各地受压迫人民自由之战的结局。只要美帝国主义仍有能力汲取、折损或毁灭革命成果，那么，地球上的每一次革命和为国家解放而进行的每一次战斗都将功败垂成。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腹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为世界范围的自由提供最根本的保证。

性别歧视和资本主义之间显然有着根本的联系，但许多女权主义代言人声称，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通过改革，在体系内部消除性别歧视的恶习，以此表明革命政治无关紧要。

我们深信她们大错特错了。

她们无视我们处于屈从地位的根源，偏信男权至上是随机的旧文化残余，以为它会在她们的义愤、立法压力、律法改革和“合理”要求之下自行消失。她们的观点是，妇女获得平等始成可能，是因为科技进步使得体形和体力的大小变得无足轻重，这无异于承认在现代科技到来之前妇女不能发挥同等作用。这是人类学的无稽之谈。

这些冥顽不化的资本主义改革派不愿意认真剖析性别歧视的诱因，因为这样会把她们引向激进政治。作为职业妇女，或是能奢侈地选择重返家庭生活或有“成功”潜力的女性，她们对

性别歧视的厌恶远不及对激进主义和地位丧失的惶恐和憎恶。为了地位、收入和前途，她们选择了明哲保身。

在关乎生存的问题上组织起来赢得改革，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是，若是起义的妇女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政党内部，如美国民主党或其他国家对等党派，只会阻挠、混淆并削弱运动本身。20 世纪初期的女权主义者把选举权当成解决妇女受压迫问题的万灵药，接着便出现了上述运动倒退现象。要想通过主流党派的恩赐来保证妇女获得完全的平等，这想法荒谬可笑，是自己给自己拆台，因为主流党派赖以生存的恰恰是资产阶级和对妇女的层层盘剥。

我们何时才能停止迷恋我们的主子，不再加入敌人的阵营呢？

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分化成右派和左派两个极端，女权主义自由派的官僚领导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精明辩护者和妇女利益彻头彻尾的敌人。她们惧怕激进主义甚于惧怕保守力量，对反堕胎者等右派要么采取逃避，要么与之妥协，给这些对妇女背信弃义的敌人壮胆助威。改革派政治的追随者恶意地给激进派妇女带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并进行政治迫害，只因我们拥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姿态及往往比较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为了保住自己在政治机构内的“可信度”和名声，恬不知耻地审查和出卖有色妇女、公开的女同性恋者以及女工们。

她们试图把一切反对侵害妇女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引入纯粹的立法行为和资本主义政党政治，从而分散斗争的力量。这些将人引入歧途的改革派当中，有很多人在运动后得到了工作和政治地位。她们只起到一种作用，即通过种族主义、反同性恋、反劳动的机会主义，牵制越来越斗志昂扬的普通女权主义者。

妇女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则干脆排斥政治，将一切政治拒之门外，认为它腐化败坏、“以男性为中心”、背离了“纯粹”的女权主义。她们认为，要求权力等于仿效男性追逐权力，妇女得尽量保全无权无能教会自己的纯洁品质。还有一种情况是，她们排斥一切反抗压迫者的政治斗争，声称只有精神上或者性爱上“赋权”才是必需的。

我们向她们申明，权力问题，即掌管我们个人生活的权力以及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权力，是妇女解放的中心议题。无视此议题无异于拒绝与压迫势力进行抗争，正中丁了压迫者的下怀。

权力本身并不代表邪恶。问题在于它集中于一小撮富人手中，成为剥削他人的手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他们那里奋力夺取控制权，发起大规模群众革命运动来夺取权力，然后把它交还给劳动人民大众。

女权主义中还存在一股倾向，她们同意激进派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或应该是比资本主义优越，但对实现的可能性却心存怀疑。她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是一种空想，宁可把精力花在近期目标上。但是，改革总是进行得稀稀拉拉，断断续续，且必须付出艰巨努力，才可能有结果。有时即便实现了一项改革，如果改革运动本身不变得激进，不继续对外添加压力，其成果也只会恶化，随后会出现一大堆新弊端。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赢得性别平等，这纯粹是一种乌托邦梦想，完全不切实际、不可理喻，也根本行不通。

其实，对热心（于运动的）妇女来说，最危险的隐患并非是改革主义者的幻想，而是对姊妹

们重建世界的巨大潜力的质疑。我们的未来像我们的精神和决心一样远大而无止境。

妇女一定要学会相信自身的力量。

女权主义：是阶级斗争还是性别斗争

那些以**男性**而非资本主义为敌的妇女自冠以“激进女权主义”。和恩格斯相反，激进女权主义者认定妇女受压迫是她们所谓的女性生理劣势，即身材矮小、缺乏体魄带来的必然结果。她们说，女人历来受男性压迫，因为男性更高大、强壮，可任意摆布女人，还因为女人的生殖功能使得她们沦为自己身体的奴隶。

在《性辩证学》¹⁷一书中，舒拉米·法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按照想象细致地刻画了原始社会妇女分娩时的剧痛，以及由于生态劣势而出现的频繁死亡和疾病。这其实是弗洛伊德似是而非的“生物决定论”的另一版本，表明男女之间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男性的优越性素来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其严重性超过了阶级和种族。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追求统治地位是男性特有的，而不是从私有财产关系的经济需求发展而来的相对近期的社会现象。

她们声称，因为目前实行了生育控制，实现妇女平等方成为可能。在她们看来，只有舍去我们生育的功能，才能获得自由，这其实是在暗示：充当母亲使我们劣于男性。

激进女权主义者称，我们需要做的是跟男性，包括所有男性，就谁应该作为社会管理者这一问题决一死战。在她们看来，真正的革命是一场性别革命，就是女性推翻男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权，代之以---是代之以女性掌权的资本主义吗？对此，她们无言以对。

激进女权主义由此得出的自然而极端的结论是女性分离主义，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势不两立。激进女权主义，尤其是分离主义者，是性别歧视者、种族主义者、反劳动者，因为她们拒绝与男同性恋、有色男性和男性工人结盟。她们相信性别歧视描划的刻板女性印象，认为女性善于关心别人，有很强的直觉；她们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男性化”而不屑一顾，奉个人体验为至高的分析方式。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者经常与最看重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有着毫无原则性的联系。性别歧视和反劳动者的立场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在激进女权主义中也能找到对应特点。信奉种族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信奉性别歧视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形成联盟，看似奇怪，其实符合某种逻辑，因为他们对阶级分析和革命的解决方案都存在对抗性。

激进女权主义者把生物与历史、心理学与文化混为一谈，忽视了女性历来受剥削和压迫的经济基础。她们声称，没有什么经济体制能够保证妇女平等，因为任何经济体制都不能确保男性沙文主义态度和文化的转变。

和自由主义的领导一样，有些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对革命的女权主义深恶痛绝，不惜与右派结盟，对左派，尤其是男性社会主义者恶语相向。

幸运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是错的：她们关于历史的分析是错误的，结论也是

错误的。女性历来比男性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生育、体力与压迫之间形成的关系是私有财产带来的结果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体制造成的恶果。原始公社妇女的真实历史已经向我们指明了妇女解放的关键，那时，现代这种对生育和体魄的价值判断还闻所未闻，社会价值由社会生产劳动大军中的妇女地位决定。

现在的情况也没变，所以社会主义---而非改革或分离主义---才是现代妇女解放的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再次给妇女带来社会生产中的平等地位，并进而取得社会、经济和个人的彻底平等。

妇女与社会主义

妇女占据世界人口大多数。我们不仅占了绝对多数，而且在每个种族和阶级中都占了至少一半。

我们是老年和青年中的多数，贫困人口中的多数，是每个被压迫少数派中处于双重压迫之下的那一半，也是经济上最受剥削的劳动者。我们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利害关系最小，但是对革命性社会变革的要求最为迫切。妇女的需要和力量是指导战略的现实条件。

除非资本主义毁灭自己，不然就无法根除性别歧视、种族主义、贫困、战争以及对工资的剥削现象。认识到这一点后，被压迫人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出路。要想找到这条出路，必须讲革命政治，而且工人阶级和世界其他一切不幸人民必须组建一个极为独立的政党。

女权主义---妇女的权利---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但是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又不尽相同。社会主义是重新组织生产、重新分配财富、重新界定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从而把权力从剥削者移交给工人，文化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新时代可以因此在世界上发扬光大。正如一切要摆脱某种桎梏、寻求解放的斗争一样，女权主义是要争取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是组建社会主义的催化剂、是社会主义的益处。社会主义是妇女解放的经济前提，反之，女权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凡是遵行男权至上的地方，社会主义便不能实现，因为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存在的、以平等为基础的更高形式的人类关系。

苏联通过实施工人掌权的工业和土地国有化，使工人、农民、妇女和被压迫民族打败了资本主义，成为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

在1917年俄苏维埃革命后的前几年，布尔什维克们将堕胎、同性恋合法化，离婚简单化，并建立模范幼托机构和集体食堂等形式，为妇女的长足进步创造了可能条件。但是赤贫、内战以及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阻碍了这个新生的工人国家实施这些社会主义计划，从而为革命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经济崩溃和大饥荒却滋养了腐败的特权官僚机构，它有权决定谁有饭吃，谁住上好房子，谁接受好教育，谁拥有好工作。

约瑟夫·斯大林代表了这类官僚机构的利益。为了巩固其政权，他暗杀、监禁、流放一切反

对新官僚自私自利政策的人。为了保护苏联统治者，斯大林推行“一国社会主义”和“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使全球革命偏离轨道。为了官僚们的利益，他们反对犹太文化，惧怕同性恋，实行国家沙文主义。妇女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为了斯大林所谓的“革命的核心家庭”的荣耀，她们被禁锢起来，沦为家庭仆人和生育工具。

利昂·托洛茨基发起了历史上著名的斯大林抵抗运动。他和列宁共同领导了苏维埃革命，同时也是妇女解放的坚定支持者。虽然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并最终遭暗杀，但他将生命中的最后十二年都用来发起一个国际运动，来捍卫苏维埃革命的果实，揭露、反对并阐释苏维埃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地位及其在国际国内局势上所采取的迂回曲折的政策。

激进派妇女组织是托洛茨基发起的运动的组成部分，旨在保卫苏维埃革命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为此而奋斗。托洛茨基主义代表民主、国际社会主义和完整的人权。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我们热心捍卫所有工人国家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敌对冲击的斗争。比如，古巴的革命人士追求社会主义和自主权利，反对美国政府对古巴的不共戴天的敌意和残酷禁运，我们对此予以坚决的支持，原因就在于此。

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来的变体毛泽东主义，为工人国家，如东欧、中国、古巴和越南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策和民主的缺乏，但是它们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妇女、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和地位。为了让被压迫人民从殖民半殖民主义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俄国和古巴为他们提供了唯一的物质支持。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攻击，官僚主义专制使苏维埃人民幻想破灭，最终酿成了一场席卷东欧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政治革命。剧变动摇了工人国家，世界目睹了一股向民主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挺进的洪流。然而工人阶级缺乏夺权所需的领导地位。亲资本主义势力成功地解体了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经济被重新私有化。结果是失业率飞涨，许多人无家可归，随处可见贫困和镇压，而最沉重的负担落在了妇女、犹太人和少数民族身上。国际上，苏维埃政权的崩溃驱使美国政府疯狂削弱世界范围内的反抗势力，入侵巴拿马、格林纳达、索马里，并在伊拉克挑起血腥战争。

苏联解体后，帝国主义立即鼓吹“社会主义已经灭亡。”但事实上，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地球上任何地方实现过。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而存在。只有等我们打破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为妇女和全人类迎来一个解放的时代，社会主义才能得以诞生。

建设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未来

原始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原本互相联系；社会面貌就由这两者结合而成。如今，女权主义作为一项运动而存在。真正的、未退化的国际社会主义也是作为一项运动而存在。但是，在这两项运动之间，分歧，甚至是冲突，却占着主导地位。女性激进派必须奋力改造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恢复其最初的联合，并将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文化高度。“哪个为首？”这样的煽动性问题只会弄得人心惶惶，不值得较真。作为一个整体的战略性组成部分，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相辅相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有原则的女权主义在任何事上都步调一致、互相依赖并和谐共存。

革命的女权主义要求妇女直接参与阶级斗争。如果一边采取观望态度，一边却鼓吹社会变革

的必要性，那只是宗派主义，结果将事与愿违。为了生存，妇女必须利用变相罢工和政治组织赢得变革。只有我们先作出表率，才能驱使工人、激进派、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性自由运动者与我们的、也是他们的问题开始斗争。此外，我们必须尽量使女权主义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对妇女施行教育，让她们意识到我们斗争本质的多样性，也就是说，要教育她们和整个工人阶级及全部的革命政治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期望组建一个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国际社会主义女权社会。这项任务不仅要求我们运用最锋利的理论工具进行透彻的分析，并且要求我们必须成为革命政治的忠实的、走在最前沿的先锋代表。

斯大林主义和和其它机会主义激进流派为了赢得人心，不惜以政治的完整性为代价来降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把我们的理念收起来，“让妇女跟着慢步前进”-----当她们是步履蹒跚的羊羔似的，我们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鉴于妇女目前的高度觉悟和强烈兴趣，再则，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合理出路，我们必须现在就朝着社会主义前进！这指明了一个重大目标，其催化力和动力足以把最谨慎的妇女也带动起来，把奉献和执着的精神传达给她们。反之，当广大被压迫民众有了作为一个整体而行动的心理准备时，如此强大而有奉献精神领导集团必能立刻将群众发动起来。

妇女不需要延伸到激进政治领域的桥梁。如果有人总是告诉我们需要它们，这不仅是对我们的欺骗，而且把我们当作无知小儿，使我们失去行动的力量。这样的“桥梁”成了一种管教中心，人为地阻止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妇女无法完全理解自己受压迫的政治内涵，因为领导阶层信奉人心控制与精英政治，会利用大规模运动来吸纳具有“潜力”的人员。同时，运动本身却被遗留在机会主义的踏车上，无休无止地运动下去，却永远停留在原地。这种联合由最小公分母（即最少的共同点）串联在一起，只会像蜘蛛网一样散裂开来。它们是对妇女的侮辱，哪怕是由其他妇女煽动的，也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社会工程师们念念不忘与下层社会“搭桥”，话听了好些年，但令RW费解的是，如今他们的“新女性”身在何处？徒劳的经历让她们士气低落，因为没人为她们提供别的出路，许多人遗憾地退出了运动。带着一名女性、一个女同性恋者或有色妇女的遭遇，她们怀着激进的想法来投身运动，结果却发现政治领导阶层不愿意、也不能用一种相应的激进态度来关注那些经历。

当我们刚刚有女权主义意识时，我们都干劲十足，但它必须用理论和组织性加以调和，这样才能承受随之而来的长期而艰苦的斗争。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阶层看不到“女性经验本身就是极为激进的”，没有阐明我们受压迫的根源，没有表明解决方案，也没有提供一种有助于妇女赢得完全解放的战略，从而遏制了运动的进展。

事实上，在各种年龄阶层、各种肤色的妇女当中，都存在着革命力量和领导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一个迫切需要实力和领袖的历史时期。不承担起这个先锋的角色，不代表自己以及妇女、工人、有色人种、女同性恋的利益，只会使革命运动倒退，不仅会延长我们自身的苦难，而且会延长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的苦难。

我们是女斗士和光荣造反传统的继承人：拉莫纳·班尼特，戴茜·宾迪，塔尼亚·本克，丁玲，魏玛·艾斯平，伊丽莎白·葛丽·孚伶，克拉拉·弗雷瑟，艾玛·勾德曼，范尼·楼·汉墨，劳瑞·

汉斯贝瑞, 姆瑞尔·黑格尼, 秋瑾, 海伦·凯勒, 尤里, 洛丽塔·勒宝隆, 罗萨·卢森堡, 康斯坦斯·马可依维斯, 葛洛丽亚·马丁, 伊丽娜·马克思, 詹尼特·麦柯克劳德, 路易萨·摩里诺, 塞尔维亚·潘克赫斯特, 罗萨·帕克斯, 露西·冈萨雷斯·帕森斯, 纳瓦尔·萨达维, 杰希·史翠特, 艾玛·特纳尤卡, 索加尼·楚斯, 克拉拉·切金 (Ramona Bennett, Daisy Bindi, Tania Bunke, Ding Ling, Vilma Espin, Elizabeth Gurley Flynn, Clara Fraser, Emma Goldman, Fannie Lou Hamer, Lorraine Hansberry, Muriel Heagney, Jiu Jin, Helen Keller, Yuri Kochiyama, Lolita Lebron, Rosa Luxemburg, Constance Markievicz, Gloria Martin, Eleanor Marx, Janet McCloud, Luisa Moreno, Sylvia Pankhurst, Rosa Parks, Lucy Gonzales Parsons, Nawal El Saadawi, Jessie Street, Emma Tenayuca, Sojourner Truth, Clara Zetkin), 以及其他许多人。¹⁸她们献身于人权和社会进步。她们深知,“激进”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本性的变革。

我们要继承传统,担负起斗争的领导责任,把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民主。人类的未来建立在我们的努力之上。妇女、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紧密联系的。

政纲

激进派妇女政纲是我们将理论实际应用于不断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理论引导我们对新情势的发展进行评估。我们对女权主义、有色人种、同性恋者和劳工运动的干预不断检验和证明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同时也丰富和拓展着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知道自己所提出的大多数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至多仅能部分或暂时实现。我们努力去争取这些虽不完善但却亟需的改革措施,以使女性能够为之斗争并得以生存。此外,实施改革的斗争是一个深刻而又激进的过程。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参与集体斗争的女性们,在学习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同时,也看到资本主义对此不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的政纲是在托洛茨基主义“转型要求”的概念上建立的,即那些源于日常需求并亟待解决方案的要求,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法完全实现,并且因此揭示了这个腐朽的制度体系。

在我们不断参与全世界范围内受压迫人民所进行的形式多样的斗争中,虽然它们尚未能代表我们所处立场的所有方面,但是我们的政纲映射出“激进派妇女”为之奋斗数年、范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

法律权利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女性在法律上不能与男性得到同等的认可。当代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着性别歧视。例如,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斗争,美国宪法仍缺少联邦“平等权利法案”,因而不能为女性的平等地位提供法律基础。

法律对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保护应高于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法律所提供的保护却恰恰相反。妇女平等和民主权利的认可却让位于资本对核心家庭制度的渗透需要,以及妻子对丈夫的服从。导致妇女次级社会地位的观念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政府政策中。

我们要求：

- 不论年龄、婚姻、残障、健康、种族、性取向、体型及体重、移民身份、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或个人收入，所有女性都享有不带性别歧视法律下无条件的平等待遇。
- 对一切形式的协商关系、婚姻关系及家庭伴侣关系，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同等法律地位的认可。不基于婚姻身份的税收优惠待遇。已婚妇女保留其姓名和独立法律地位的绝对权利。离婚应基于 " 双方无法和谐共存 " 的理由，任何一方均有权享有此类不可争辩的权利。对子女的监护及家庭共有财产争议应由一个非抗辩式、由社会赞助的、合格的家庭委员会解决，该委员会应由当事人双方共同认可的专家及普通人员构成，上述争议解决应无偿提供。取消通过抗辩式法院体系解决离婚及子女监护问题。妇女及儿童有合法离开其家庭的权利。
- 扩大和保障公民自由，保障提出异议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涉及各领域的隐私权，尤其是在民权一贯受到压制的工作自由上。

经济平等

妇女重新回到与男性平等起点的有偿工作的各个领域，是其获得社会平等权利的至关重要的杠杆。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却给妇女以最沉重的打击。经济上的依赖，不论是对男性或在福利上，都是对自由和独立的根本背离。由于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女性“情绪化”因而具有“不稳定”性，也因为妇女在经济交易中未得到足额补偿而获得独立资格，女性在经济交易中不断面临歧视待遇。

我们要求：

- 在雇用和升职机会上采取纠正歧视措施，保护资历。在妇女和有色人群雇用率偏低的工作领域，不同种族或性别应分别遵循不同的资历标准。使妇女、有色人群和少数民族平等进入一切工作领域的机会在法律上获得可适用的额度标准。
- 妇女、有色人群、残障者、老年、青年和移民劳工享有同工同酬或同类工同薪酬的权利。
- 在工作场所或场所附近提供由企业和政府资助、社区管理的 24 小时免费托儿中心，向儿童提供教育、娱乐和医疗设施。
- 带薪孕假、新生儿保育假及重大疾病的病假。在此期间不得降低福利、资历或工作地位。
- 人人享有安全工作条件。消除影响不正常多数妇女的危险工作环境，尤其是妇女中的有色人群和移民。停止以不安全工作条件为藉口，排除妇女进入某些工作领域。一切工人均有权因危险工作环境或危险操作而暂停出工。在问题解决之前薪酬照常。
- 雇主基金的全薪病假制度，时间长短不限。在医疗保障未国有化的地区，推行全日制及非全日制工人的雇主出资的全方位健康保险。推行雇主资助的家庭内部伴侣福利制度。
- 推进工人控制的夕阳工业的国有化进程。
- 为伤残工人及因工厂关闭、实行自动化或减员增效而遭解雇的职工提供由公司和政府组织的再培训上岗机会，薪酬不减。
- 妇女享有进入各行业成为学徒的平等权利。积极推进在非传统行业的课程计划。停止对各行业妇女的胁迫及身体攻击。
- 通过统一降低日均工作小时数而不断减少工作时间，直至达到人人都有工作，且人人都按工会确定的工资标准获得全天工作报酬，以此达到全社会就业。
- 工资常规性自动上涨以完全符合生活支出的增长。

妇女和工会

女工和工会成员是劳工运动复兴的关键。作为最低收入人群，我们反对歧视、争取权利的斗争为劳工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我们要求：

- 妇女在工会成员和领导层发挥功能的绝对平等权。工会成员构成中不同种族、性别和语言差异应反映在领导构成上。工会组织的学徒计划应包括积极的就业和培训举措。
- 工会应组织一些大规模、激进的群众运动，以便将原本没有工会组织的社会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尤其是一些妇女和有色人群。劳工运动必须为所有工人争取平等的权利，触及各类社会问题，并且优先考虑妇女、有色人群、移民以及同性恋者的需要。
- 工会民主：工会成员有权通过充分讨论和多数投票决定其工会的目标和重点。工会内部的言论自由，包括激进分子发表言论的权利。
- 工人的军事化行动，包括团结一致反对政府以及对某一部门劳工运动的商业冲击的全面罢工。联合其它国家劳工一致反对打击工会的跨国公司。用“购买工会工人制造的产品”群众运动代替购买美国货运动。
- 成立反资本主义工会政党，使之成为代表劳工的独立政党，结束工会官员与亲资本主义政党的长期联盟。
- 终止 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业组织议会）对美国自由劳工发展机构的支持，终止 AFL-CIO 对那些打着其他旗号实则为 CIA（中央情报局）工作来打击第三世界独立工会组织的机构的支持。

生理自主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女性被视为男性、教会及国家的财产。为获得对生活的控制权，我们必须索回自己的灵魂和身体。

我们的性生活应由自己决定；我们必须自我定义。女性解放最根本的是作为独立个体所享有的、基于自身判断来行使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利，免受经济或社会的压迫。生儿育女仅为妇女生命的一部分。子女不应成为我们个人的责任，同时我们也不应被迫生育。

我们要求：

- 妇女的生育抉择或其在怀孕期内的决定免受来自国家的干预。
- 不论年龄大小，向一切有此需要的妇女提供便利的避孕信息，以及向她们免费提供安全避孕手段。发展和倡导对男性和女性都安全可靠的避孕手段。
- 严禁强制绝育或迫于压力、信息不全及未能全面了解后果而“同意”的情形下实施绝育。未经妇女知晓及在妇女未获得全面信息并同意之前，不得对妇女进行实验。停止对土著及殖民地居民、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及残障人群实施生殖灭绝。停止在第三世界国家以帝国主义手段渗透种族灭绝的“人口控制”计划。
- 向一切有要求的妇女（含 18 岁以下）提供免费、安全和便利的流产措施，无需父母、孩子的父亲或法院的通知或同意。在法律和医学上明确承认妇女的生命和生存权高于胎儿的生命和生存权。
- 消除双重性别道德标准。已婚妇女有权保持婚外性关系而免遭不公正的“通奸”罪名的指责。未婚妇女有权具有一切性倾向，以便获得性方面的自我表达及享受自由的性生活，

- 免受社会和宗教歧视和恶性法律的规范。
- 实行公司国有化以发展新的生育技术，并确保该技术受妇女的控制并为之服务，而非相反。再生技术应当且仅应在获得妇女同意后引入。禁止赢利机构从事代孕母亲行业。承认代孕母亲作为劳工而享有的权利。代孕母亲应享有同样的权利，变更心意以及作为母亲将其婴儿交付他人收养。
- 提供优质免费孕期照料和生产服务。
- 向一切年龄阶段的学生强制进行非性别歧视、不带同性恋恐惧的性教育。

优质医疗保障

我们不应将身心健康交给一个受利益趋动、漠不关心的医疗体系，让它们藉着我们的疾病而赚取利润。一流的医疗保障是一项基本人权。

我们要求：

- 所有人都应当获得免费优质、信息全面、预防性及康复性的医疗保障。
- 一切医疗行业国有化，包括医药、保险和家庭保障服务，并使上述机构处于保健工作者和医疗服务接受者的控制掌握之下。医疗工作者均享有工会工资。
- 人人有权不受限制地享有优质的心理健康治疗，免受来自外界的压力而不得不囿于传统性别角色或异性恋关系。停止一切旨在阻挠妇女抗争，利用有害药物、休克疗法及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使妇女安于“她们的位置”的治疗方式。停止通过精神疾病治疗行业及通过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测试方式对女性进行奴役。
- 对影响妇女及其他受压迫人群的疾病进行公正的研究、预防和治疗，给予全方位资助。消除掠夺性地利用妇女，将其作为医用“实验标本”，这种现象在有色人群妇女及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普遍。停止将针对白人男性开发的研究结果用于所有人群的疾病治疗的一切手段。
- 为艾滋病的研究、治疗、处理和预防提供全面资助。向所有艾滋病及 HIV 阳性患者（包括妇女，现已将妇女排除在常规测试人群外）免费开放提供试用药，该过程应向使用者全面告知并基于自愿原则。HIV 测试应为免费、自愿且匿名，排除强行检测。取消对艾滋病患者及 HIV 阳性人群的隔离措施。为艾滋病人群提供住房、育儿、医疗、咨询及有保障的收入。为一切年龄人群免费提供符合当地文化的安全的性教育及资料。禁止对艾滋病或 HIV 人群的歧视。
- 通过全面资助教育、研究、处理、治疗和预防，从而消除乳腺癌疾病。为一切试制药免费提供便利。扫除环境中的致癌因素。免费向所有妇女提供技术先进、低辐射的乳腺 X 线照射。免费向乳腺癌患者提供一切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治疗和检测。利用学校向所有年轻妇女传播乳腺癌预防教育。向一切癌症患者提供住房、育儿、医疗、咨询和有保障的收入。
- 毒品合法化并由社会控制，以剔除毒品商的暴利、降低成本，以此减少嗜毒者经济犯罪。对毒品质量进行管理控制。免费提供消毒针，以及免费向吸食毒品者、酗酒者提供非歧视、便利、自愿的治疗计划。建立全球性的、文化有别的教育计划，消除吸毒。禁止强制性毒品检测。
- 人人有权基于全面的信息对自己的健康作出决定，包括选择法定监护人（若有此需要）。人人都有权选择或拒绝医疗救治，不论其受孕状况。人人都享有死亡和合法获得安乐死的权利。
- 人人都享有在育婴机构和心理健康机构接受医治的完整的公民权利。

儿童权利

在核心家庭的内部阶层中，儿童处于最底层，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心灵或身体没有控制权。他们承受资本主义制度下来自核心家庭的压力、冲突和分裂最严峻的打击，却无从躲避。等级阶层社会经常通过不确定的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剥夺儿童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策权利，而这些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规范通常无视儿童的个体和不断扩展的能力。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因此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担负起对年轻一代的责任：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的软弱提供庇护，使他们融于社会并为他们提供教育，并帮助他们打开核心家庭闭锁的监门。确保儿童免受压迫性家庭关系的压力，使其父母从孤立、封闭抚养子女的角色中解脱出来。

我们要求：

- 儿童有权在经历和能力的最大程度上受到与有能力参加社交活动的成年人一般的尊重。
- 无论儿童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论父母出于何种理由将其放置于该中心，条件良好、由社会控制、行业或政府资助的托儿中心应免费向所有儿童 24 小时开放。该类中心应配备经专业训练并享受工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人员。
- 确保儿童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包括全面、自由的医疗、牙齿保健及心理健康、居住、服装及营养饮食。向所有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儿童提供免费早餐、中餐及晚餐，不论其是否为移民身份。
- 全面保障儿童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以及来自机构、个人（包括父母）的性强迫、性骚扰或性奴役。法院及社会福利机构应当努力强调保护儿童免受家长虐待高于“保持家庭完整性”。不得忽视或无视儿童对性虐待的证词，停止对那些因无力控制的经济或社会原因而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关怀和保护的母亲进行无端指责。社会应对负有儿童支持或儿童保护义务的机构进行监控。
- 承认儿童拥有按其自身条件、以自己的步骤达到性成熟的权利。
- 政府有义务无偿地为特殊问题儿童进行社会资源分配，例如艾滋病儿童、残障儿、无家可归儿、以及吸毒或酗酒儿童。
- 实施教育计划，帮助家长、老师和托儿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不带性别歧视的游戏引导儿童进行自我表达。
- 消除由于贫穷而使儿童被他人收养的现象。禁止从收养儿童中谋求利益。禁止贩卖婴儿。
- 青年有权自行成立组织。
- 禁止警察对青年进行骚扰和种族登记。

教育

妇女在受教育方面受到双重歧视。首先，由于文化设定，我们没有同等机会自由选择学术领域，许多领域将我们拒之门外。其次，女性的历史在主流课程中受到嘲弄，备受忽视。

我们要求：

- 在一切学术领域、职业学校、服务性和职业培训学校中享有平等权利。男性和女性运动项目应享有同等资助。消除考试中的种族和性别歧视。学校的所有招生委员会中都应有妇女和有色人种的代表。
- 消除含有歧视女性的教育材料和教导说明。教师队伍多元化，不同的级别都应配备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等教员。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变性人以及左撇子应有权从事教学，免受骚扰或歧视。

- 在各阶段进行免费、高质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教学，从小学到大学都应有自由民主氛围以及对持不同政见和不信教者的尊重。不得以精英派、象牙塔的名义将大学与受压迫群体各社区割裂开来。
- 在各教育阶段都应设置相关课程，以体现人类进步的所有方面，包括经常被忽视的、受剥削压迫阶层的创造性艺术和表现艺术、语言、性别教育及其真实历史。取消公司对课程和研究的控制。建立女性研究、种族研究、性取向少数派研究和劳工研究的系科，并为之配备相当资历的教师从事压迫和反抗历史的研究和教学。不论何种学科领域，都应设置上述必选课程。
- 揭示文化、宗教中关于妇女的“劣等性”是基于生物、社会、心理及社会人类学的科学研究结果的错误印象。在各学校掀起性别意识形态的国际性运动。
- 向所有学生提供生活费。在各校园里推行双语、多元文化的免费托儿中心。
- 向脱离学校多年的妇女提供速成、转型课程，降低其入学资格要求。
- 学校应由社会、教师、父母和学生控制。行政人员和校长应执行社会确立的政策，不应向学生和教师发号施令。
- 教师 and 所有年级的学生均有隐私权、言论和结社自由，和组织社团的权利。校内体罚应定为非法行为。
- 在多数语种和少数语种上进行全面的扫盲运动。确保每一个人均有权自由选择语言，并用这种语言学习读书、写字。允许以学习上述技能为目的的带薪假期。
- 提高教师的薪资水平，用公司纳税款资助学校。

政治

获得选举权过去曾是妇女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政治上的平等。资本主义政党或是通过颂扬核心家庭及其传统价值观的“优点”，或是将自己装扮成代表妇女权利和平等的倡导者，但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真正可能为妇女的权利进行斗争或争取到全面的权利，因为他们都致力于从妇女劣等社会地位的社会体系中获取巨额的利益。

妇女、有色人种、性取向少数派群体及工人应仅仅支持社会主义者或反资本主义劳工倡导者，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为自身利益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只有这样一个政党才能确保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并代之以一个新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要求：

- 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和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导的权利。
- 所有受压迫团体都有在任何机构内成立核心小组的平等权利。
- 所有女性立法者都应为女性利益采取负责行动。
- 代表少数利益的政党有参加投票、见诸于媒体及获得捐助的平等权利。

有色人群、少数民族或种族及土著国家

对妇女进行压迫的制度，同样也奴役着有色人种、土著国民和少数民族。大家都被资本主义利用来实现其利益。整个运动中我们应当学会一点，那就是，如果仅去迎合斗争中最占优势的力量或允许反同性恋或反犹太主义者在我们中间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就不可能达成有意义的团结一致。

有色人种妇女及少数民族妇女承受着最严重的压迫，因为他们受到三方面的歧视——种族、性别及社会阶层。同性恋有色人群也面临反同性恋的迫害。他们也代表和反映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需要。只有在有色人种中的女同性恋者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平等才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实现。

有色人种妇女、土著妇女、少数民族妇女的领导作用对未来革命起着决定作用。在破坏私有财产制的过程中，她们损失最少，却获利最大。她们严肃认真，富有奉献精神，再加上长期参与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统治阶级的斗争，这为统一和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我们要求：

- 消除一切形式的基于种族和人种的歧视：社会、法律、政治、文化、语言和经济。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参与社会各方面生活的权利。
- 纠正歧视措施，积极为所有有色人种和少数种族，尤其是妇女，提供就业、晋升和教育机会。
- 废除一切限制有色人种入籍，以及对未登记入册的工人和有色人种公民带有歧视性的移民法律，以及离间本地矿工与移民矿工（移民矿工事实上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同盟者）的法律。放开一切对国际间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
- 反对公开、间接剥夺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移民选举权的行为。强制实施多语选举，以及选举材料和选举运动信息的多语化。
- 立即取缔警察的野蛮执勤，以及民族骚扰、民族恐怖主义和杀害有色人群、少数民族的行为。建立由社会控制、经选拔的警察评审组，独立于警察队伍，并有权管理、解聘对有色人种、青年、同性恋者、工人和妇女实施酷刑、骚扰、杀害行为的警察。警察是有权阶级的武装机构，但无法管辖自身。
- 赋予一切被压迫民族和土著居民自决权，包括美国土著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毛利土著居民、苏格兰土著居民、库尔德人、波多黎各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
- 消除种族主义、反移民和反犹太的暴行和对其他民族的迫害。
- 消除所有语言歧视。所有国家机构都应完全实行多语化。

性取向少数派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以及易装癖忍受了社会的极端歧视，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核心家庭的“圣洁”直接构成威胁。艾滋病危机的出现使男同性恋成为替罪羊，导致针对各类性少数人群的歧视和暴力激增。

一切受压迫人群也应当包括所有性少数人群的需要，以使我们所有人都获得全面、自由的解放。女同性恋面对最强烈的性别歧视，而女同性恋中的有色人群还额外忍受着种族主义的歧视。为了在一个残酷压迫、充斥敌意的社会中求得生存，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女同性恋中一大批人成为独立、坚强和有能力的强者。这些妇女中一批有志于领导女权主义运动的潜在力量能够推动整个女权主义运动。

我们要求：

- 消除对女同性恋者和一切性取向少数派人群在社会、政治、道德、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歧视。在立法中贯彻性少数人群歧视的非合法化原则。

- 立即取缔警察对性取向少数派人群的骚扰、野蛮执勤和杀害行为。
- 性取向少数派人群有权照顾和抚养他们的孩子并有权长期或短期领养孩子。消除因性取向、婚姻状况或种族原因对有愿望领养孩子的成年人的歧视。
- 针对禁止性取向少数派或患有 / 疑似艾滋病患者入境的移民法进行逆转立法。
- 禁止媒体恶意、摧残性地表现性取向少数派人群。女同性恋者病态的、仇视男性的形象一直以来被利用来分裂女权主义运动。我们谴责这些谎言和中伤的伎俩。
- 向一切性取向少数派人群和独立的妇女提供医疗福利、保险，并给予他们带薪丧葬假和重大疾病的带薪假期。制定家庭伴侣法律，允许所有人——同性恋和非同性恋——享有家庭关系自定义的利益。保护家庭伴侣的隐私权。
- 取缔反鸡奸法律和其他一切限制基于自愿的性行为的律法。

老年妇女

老年妇女在社会中陷于困境。针对一切妇女的歧视与剥削在她们身上进一步恶化。那些所谓尊重老年妇女地位的自以为是的证明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 65 岁以上的妇女是社会中最穷困的人群。

妇女们年轻时经历的劳累和贫穷最终加剧了老年期的穷困和孤独。在职妇女薪酬不足，导致社会保障、医疗和退休福利也不足，因而陷于不断高涨的医疗支出与生活支出的困境中。

女性家务劳动以及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功劳不能得到社会足够的认可，而那些极少的认可度在她们过了生育期后又完全消失。她们为社会其他成员所鄙视和忽略。老年妇女所忍受的穷困和孤独是对所有女性的藐视，也是我们女性解放斗争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

老年妇女是妇女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为争取生存、反对压迫长期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刚刚意识到女性严峻的生存现实的年轻女性提供了无价的经验和智慧。女权运动建立在她们的辛勤工作和全心投入之上，并在她们的持续参与和领导下不断深入。

我们要求：

- 为所有老年妇女提供有保障的、符合工会标准的、可赖以生存的养老金。
- 提供全面、尊重、体贴、免费、人员齐备、多元文化和多语言的医疗保障，其中包括医疗和家庭护理。取缔利益驱动、剥夺人权的监护机构。无偿提供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一切相关技能、个人服务设施、运动和治疗方案。免费提供便利的交通。提供免费派送的高质量、营养充足的三餐。
- 不论年龄大小，有权享受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禁止强行退休以及招聘中的年龄歧视。为年老而不愿意退休者提供工作和培训。老年工人享有与其资历相当的权利，并应制定健康、安全规范保护老年工人。
- 创造免费、优质并受老年人控制的社会、娱乐资源。
- 从根本上消除对老年妇女施行暴力或暴力胁迫。
- 禁止媒体对年老者尤其老年妇女的成见，诸如将他们比喻成小孩，毫无用处、缺乏独立性等。禁止对老年妇女和老年男性进行压抑性的道德灌输。

年轻女性

年轻女性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压迫，沦为家庭和教育的囚徒。她们受制于强烈的社会化性别角色定位，能力被限制，机会被剥夺，自我价值意识被破坏，并丧失了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女性性别使她们更易遭受压迫，而青春又使她们对此显得相对脆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年轻女性是父母或所有者拥有的物品。她们挣脱核心家庭束缚的斗争，并由此发展形成的活力四射的领导群体，对所有女性的解放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求：

- 解除所有年轻女性在家庭、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中受到的性别歧视的压迫，并赋予她们发展体能、智力、社会、政治和性能力的权利。立即终止因性活动或者因拒绝被动成为“女性化角色”而对女性进行胁迫或机构控制。
- 建立集体家庭使得年轻人可以与他们的同龄人以及融洽相处的成年人共同生活和成长。在法律上承认年轻人进入和离开家庭或集体家庭的权利。
- 禁止将年轻人当作廉价劳动力进行过度剥削。为年轻人提供工作和培训的机会，尤其是有色人种中的年轻人和年轻女性。他们在工作场所受到双重和三重歧视。为择业中的年轻人提供同工同酬和工会保护。在培训或招聘机会中不应有性别偏见。
- 停止通过广告和色情产业对年轻女性和孩童进行剥削和误导。
- 年轻女性有权决定是否生育，包括堕胎。给予未成年母亲社会和经济上的帮助。向愿意继续学业的年轻母亲提供优质的教育和育儿服务。

残障妇女

残障人群是一个数量可观的少数群体。例如，22岁至64岁之间的美国人，有四分之一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或智力缺陷。造成残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战争、不安全工作条件及贫穷，都直接与资本主义有关。残障人在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面临着歧视和隔离。

残障妇女尤其不被正视，同时还被烙上变形、无依无助、无性的社会标签。尽管在性特征上受到否认，但她们还是性虐待的主要受害者，尤其是当她们有智障或被机构所控制时。

有残障的男女工人是一个受到极度剥削的群体。他们或是薪酬极低，或是成为无偿劳动力。体制迫使残障人被社会隔离，他们二级阶层的社会地位被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大量资金投入是使残障人更加依赖社会，而非想方设法培养他们自治和自给自足的能力，而使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要求：

- 完全接纳残障人进入社会大家庭，包括赋予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免受歧视的保护。用完全由政府和公司资助的方式向所有残障人提供先进的技术援助。
- 为残障人提供交通、建筑 and 所有公共设施的便利。为残障人提供免费交通。
- 免费提供全国性的优质医疗保障。
- 无歧视的工作培训和雇用。采取纠正歧视措施，积极推动雇用残障人的配额制。为残障人设计、改造建筑和设备。为残障人提供适合生活的工会工资水平。无例外地向残障人提供最低工资。为所有残障人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为在血汗工厂里被迫工作的残

- 障人组织工会。向所有不能工作的残障人提供有保障的工会工资标准。
- 为残障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权利，包括为残障人改造教育设施。在各个教育层次全面资助智障学生的教育计划。
- 禁止社会和媒体对残障人的偏见和对他们能力的忽视。
- 政府应在文化、教育和政治事件上为听力障碍的人提供视读资料。
- 为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提供残障人权利的培训。消除政府机构内阻碍残障人获得必要帮助的官僚设置。

妇女和贫穷

有限的机会使得许多妇女在经济上必须依赖社会福利救济而生存，尤其是单身母亲。对于有色妇女而言，这一点尤为突出。因为种族和性别使她们在教育和报酬丰厚的工作机会上比一般妇女更少。

工人阶级斗争最终获得福利救济，目的是保护工人不受永久失业和穷困的侵害，而这些正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但是这一项斗争的重要成果却被曲解，产生具有依赖性、无能和玩世不恭的制度，这种制度下妇女不能接触那些造就女性力量和自立的工作。若女性希望获得平等权利，她们就必须获得培训和经济上的独立。

事与愿违的是，即便是有限的福利救济也不能为大多数人所享受。例如，在澳大利亚，那些被认为与他人有性关系之嫌的单身父母会被立即切断社会福利救济的来源。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母亲和无家可归者无法获得社会福利救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极度穷困和无家可归者像瘟疫一般，无情地控诉着这个制度。

我们要求：

- 向所有人提供有保障的、工会标准的、可赖以生存的工资水平。
- 立即取缔强迫劳动和利用经济胁迫进行的培训计划，消除强迫妇女接受低于工资水平、非自愿的工作。此类计划将领取救济金的妇女当作廉价劳动力，以此瓦解工会运动，为大型企业创造超额利润。
- 在所有行业向妇女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女性”行业。
- 向所有福利救济接受者提供公平的冤情投诉程序的免费法律援助。停止对福利救济接受者进行调查。
- 向儿童提供 24 小时免费优质的抚育服务，包括交通及提供免费一日三餐。
- 整合家务、烹饪和养育儿童等工作，使之成为有偿劳动并成为社会化而非个人义务。在这些社会必要劳动仍为妇女在家庭中的个别义务的前提下，政府应向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支付工资。
- 为穷困者提供政府资助的优良住宿条件。消除对福利救济接受者的住宿歧视。不得向无家可归者提供危险、没有人性的仓库式栖身处。向所有人提供有营养的食品。

狱中妇女

监狱是实施社会控制及非人道惩罚的机构，并非救治性机构。被指控方的种族、性别、性取向、政治意识和社会阶层等因素在定罪和判刑上的作用通常超过他们所犯罪行的大小。

妇女经常因为经济窘迫或出于对丈夫或男友野蛮行径的自卫等罪行而被监禁。被监禁的妇女总是处于不体面的生活环境，并受到身体、心理和性方面的骚扰。

我们要求：

- 有权享有无偿优质的法律咨询。禁止定罪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消除对犯人和刑满释放人员一切形式的歧视。
- 取缔种族主义者、反工人阶级者和反激进分子的死刑。
- 释放所有政治犯。取缔那些使用麻痹性措施并特别针对政治犯的控制小组。
- 犯人有权自行组织保护自己免受报复。
- 监狱应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和体面的生活条件。停止对犯人进行医学试验和测试。不得对艾滋病患者或 HIV 阳性犯人施行歧视性判决或歧视待遇。向所有犯人免费提供避孕套和卫生的避孕注射剂。
- 在监狱里对犯人进行工作培训和教育，包括非传统行业。停止将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进行剥削。向犯人提供工会工资水平的就业。
- 监狱犯人应有权保留对其子女的监护权，并有权选择是否将其子女留在监狱内共同生活。为狱内母亲提供充分的育儿设施。所有狱内人员均享有不受监视、不限次数的朋友、亲属和爱人的来访，该权利不应考虑性取向或婚姻状况。
- 消除狱内犯人的性骚扰现象，尤其是对男女同性恋者。消除对犯人的种族和性别暴力。停止对狱内犯人进行光身搜查，消除狱内强奸。

卖淫合法化

卖淫是中产阶级一夫一妻制、中等阶层道德意识和清教主义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假定社会的建立需要保持男性主导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由于婚外性关系作为一种禁忌，卖淫将一直存在，直至这种关系和道德价值被革新。

女性在这里又一次成为牺牲品。缺乏工作培训、职业技能和教育，某些妇女沦为妓女。这种角色使她们承受经济、法律和道德的极大压力。职业的非合法性使得她们遭受来自客人的暴力，受到依靠她们生存的皮条客的超额剥削，还不断遭到警察和法院的骚扰和虐待。这些机构将她们作为最低等的罪犯来处理。

在努力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性商品化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同时保护那些受侮辱和虐待、从事性服务的工作者，不论其工作是卖淫还是其他任何形式。

我们要求：

- 立即无条件地使卖淫合法化。合法化是指使卖淫完全非罪化，性工作者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法律指控、罚款、起诉或规制。相反，她们可以获得法律保护，免受来自皮条客、警察和客人的暴力和胁迫。妓女有权获得警察保护。
- 将妓女职业纳入到工人阶级行业中，赋予她们基本的劳动保障和组织工会的权利。妓女有权掌握她们的收入，免受皮条客从中抽份。保障卖淫者最低工会工资。
- 按妓女的要求向她们提供免费医疗和例行检查。
- 妓女有权监护她们的孩子。
- 消除卖淫行业的根源：贫穷、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向所有从良妓女提供从事另一职业的免费职业培训和再就业。

针对女性的暴力

作为女性，我们的一生中每天都在经历暴力事件。我们的身心不断受到来自权力高于我们的男性武断而无情的古怪念头的侵扰。他们是我们的老板、丈夫、父亲、同事、警察和政府官员。

强奸是男性掌控权的延伸，是一种使我们维持“地位”的恐怖形式。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强奸分子不错的猎物。当我们遭受强奸且向当权者申诉时，却被指责是“自找的”。警察、医疗机构及法院对性骚扰受害者毫无人性的对待是基于与强奸者一样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意识被官僚主义的烟雾所掩盖并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

这种态度甚嚣尘上，它的极端表现即为“罪在受害人”。这使那些成功保护自己免受强暴的女性，尤其是有色妇女经常遭受指控并遭遇监禁。

家庭暴力已经发展到了跨越一切阶级和种族界限，肆虐蔓延、无处不在的态势。警察把婚内骚扰简单地当作“口角”处理，置女性于这种可能升级到谋杀的侵扰而不顾。经济和司法体系经常强迫挨打的妻子回到致死的绝境。

事实上，父权制建立在对女性强暴、非人性剥削的基础上，并因此维持了它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将自己从暴力中解放出来，只要我们携手，掌握权力，将社会建设成一个没有心理和生理暴力的社会。

我们要求：

- 享有不受性侵扰或攻击威胁的、自由生活的权利。享有对一切形式的性暴力进行自卫的法律权利。工作环境免受性骚扰。
- 为强奸和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全面的治安和法律保护。立即对所有指控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在法律上平衡攻击者享有的无罪推定和保护受害人免受再次骚扰或伤害的优先权。
- 对一切强奸嫌疑犯提起公诉，举证责任应由当局承担，不应在受害人。婚内强奸应定为非法。尊重暴力犯罪受害人对自己案件的法律导向的选择。
- 向一切性骚扰的受害人免费提供同情性医护。使性骚扰受害人免受来自社会、自以为是的道德谴责，这种问题产生的首要原因是社会本身。
- 向逃避家庭暴力的女性提供国家资助的收容所。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职业训练和再就业机会。
- 对幸存者于强奸或暴力罪行的受害者进行补偿，包括其损失的收入、精神抚慰金、医疗费用以及因该攻击而产生的其它开支。

环境

资本全球化破坏着这个地球。在一个为了快速赚取利润而不惜以我们自身和后代的生活为代价的阶级的统治下，我们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我们的食品、水和空气中存在着各种化学品，工作场所、家庭住所和社区里存在着各种有害物质。妇女忍受着最差的工作条件，况且

我们的身体可能对环境某些有害物质存在着特殊的敏感性。

女性在反对农药、有毒核废料、滥砍森林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破坏环境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技术可以用来为人类的进步作贡献，但若这种技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则会起反作用。

我们要求：

- 资助保存和保护环境的行为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再循环或恢复，并为此进行宣传教育。
- 公开能源消耗大户的会计账簿。能源产业和石油化工产业实行国有化，置之于工人的控制之下。发展保存和改善全球生活水平的安全、充沛的能源形式。
- 立即关闭一切核工厂。停止制造核武器。禁止倾倒核污染物，对现有的放射性废物进行安全处置并由社会监控。公司必须全面负责核工业工人的再培训和再就业。
- 消除在环境和工作场所中存留的致命农药、毒药以及有害垃圾。公司应承担一切清理废弃物的成本以及一切修复环境破坏的支出，不得将工人的纳税金用于清除垃圾。
- 取缔一切露天矿藏的开采，尤其是致癌的铀矿开采。禁止抢夺土著人的土地用于矿藏或其它资源的开采。
- 在所有工人中严格实施安全和健康标准，尤其是从事环境有害物质清理的工人。
- 禁止公司丢弃垃圾并将有害工业转移到贫穷社区、印第安保护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制定严格的国际标准，阻止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污染其他国家。
- 以人道主义方式对待动物，对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进行全面保护，包括雨林、冻土和海洋。动植物的生存对人类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不应构成对我们自身健康的威胁。

媒体和文化

广播、电视、视频游戏、新闻、电影，所有这一切都对女性进行恶毒和偏激的攻击。女性被描绘成空虚、无用、无能的傻瓜，只会勾引和控制男人，或是受虐狂、头脑简单的性对象。我们习惯于用我们的“性吸引力”来兜售一切。

男性沙文主义渗透于当代文化之中。大多数男性，正如许多女性一样，接受这个观点，并在生活中习惯性地加以运用，尽管他们对此充满了迷惑、失望和苦恼。与此同时，性别刻板印象不断衍生滋长，而真实反映我们生活的信息却经常被审查监控，不让我们知晓。

我们要求：

- 停止向公众灌输女性及有色女性那种病态、扭曲和贬低的媒体形象。停止宣传骨瘦如柴、曲线突显的白种美女形象，对其它体型和肤色的女性进行夸大性歧视。
- 消除在广告中将女性和儿童作为性交易的筹码。禁止将对女性施暴镜头作为产品宣传的卖点。禁止旨在培养儿童消费心理的广告，禁止有害儿童健康或不利于他们形成对他人观点的产品宣传。
- 在媒体中进行妇女权利斗争和一切受压迫人群运动的严肃报道。取缔对女性历史和女性问题信息的审查制度。放开媒体所有政治观点的报道。制作反映一切带有多多样性的人类经历和生活方式的节目，包括有色人种和性取向少数派人群。消除媒体中一切形式的偏见形象。
- 消除资金雄厚的国际色情行业对妇女儿童的残酷剥削。

军队和征兵

我们反对义务兵役制度，反对强迫工人阶级保卫帝国主义、杀害他们的阶级姊妹和兄弟。但同时我们也反对许多国家在征兵中排除妇女的性歧视规定。

女性没有机会参加军事训练，在军队中遭受性别上的偏见和经济上的歧视。我们认识到妇女和其他受压迫人民都有学习军事技能，用以防身自卫的必要。

我们要求：

- 取消征兵制。不得为帝国主义战争牺牲人的生命或为之提供任何公共资金。在征兵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不得将女性排除在征兵登记或征兵之外。
- 消除军队里对妇女、有色人种、性取向少数派群体和军内母亲的偏见和对之进行工作歧视。
- 所有军人均享有工会工资和组织工会的权利，退役后享有培训计划和再就业安排。
- 向所有人开放免费自愿的军事训练。
- 在世界范围内撤退帝国主义军队和军事顾问。取消军事预算并将该经费用于社会服务。
- 美国不得干涉其他国家。取缔由美国资助的、为镇压民主和人民起义而训练的右翼敢死队和部队的美洲学校。对反帝国主义斗争给予全面的支持，所有民族都享有自治权。

自卫权

我们支持各地受压迫人民为实施自我保护而反抗暴力的权利。不论该威胁是来自右翼敢死小分队、防暴警察，抑或来自失控的丈夫、白人至上主义者、种族主义暴徒、同性恋攻击者、纳粹国家或极权国家，我们相信有组织的社会自卫是关乎生存和常识的问题。

我们并不是向被种族主义攻击的有色人种或是受法西斯暴徒攻击的反纳粹活动家宣扬“将另一半脸转过去给人打”的自我牺牲精神，也不向中美洲的农夫建议将他们的武器交给曾镇压并杀害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国家政府。我们支持那些实施自卫以及保护她们的孩子免遭强奸或骚扰的女性，那些为防范同性恋仇恨者而组织防卫小分队的性取向少数派人群，以及那些维持他们的统一防线、防止反工会组织的工贼的工人们。

非暴力问题是一个战术问题，而非绝对的原则问题。我们并不提倡鲁莽的冒险主义行事方式或鼓吹与警察、纳粹分子或工贼们进行冲撞，事实上肉搏战并不能产生什么结果。

我们要求：

- 在法律上承认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自卫权利，其中包括社区组织的反对警察野蛮执勤、种族主义分子和纳粹分子的攻击，对施行堕胎的诊所进行攻击、反同性恋行动、破坏罢工及其他形式的压迫性暴力或恐怖主义行径。

反对右翼及法西斯主义的联合阵线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保守的右翼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更为猖狂。他们的目标是不惜一切

代价保证利益。为避免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体系将求助于成熟的法西斯主义，配之以法西斯的种族灭绝政策、反犹太主义政策、性别歧视政策和反同性恋政策。一旦掌握权力，法西斯就会打击一切工会和工人阶级社团或组织，并剥夺一切受压迫人的民主权利。

女权主义运动是这场与超右翼派斗争，尤其是堕胎权利斗争中的先锋部队。女权主义备受恶毒的攻击，因为它挑战核心家庭至高无上的权威。相反，女性却具备着将每一个目标运动联合起来的能力，并组成一个反对法西斯和右翼分子的联合阵线。

联合阵线意味着有一个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团体和实施计划。当小规模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组织掌握领导权，联合阵线即遭破坏并朝反方向发展：成为一个机会主义和背叛本阶级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努力维持现有秩序。他们总是默认统治阶级的统治，而正是这个统治阶级资助和支持了人民的保守派。

在击败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不能为宗派主义、性别歧视和偏见者留有一席之地。联合阵线必须拥有广泛的组织基础，这些组织延伸扩展至囊括组织的左派，也同样包括工会、有色人种、犹太人、女权主义者、民权解放运动家以及性取向少数派人群。

我们要求：

- 建立民主统治的联合阵线组织，由其内部成员进行决策。每一个参加阵线的组织机构保持自己的计划纲要，并愿意在反对保守派的具体行动中合作。
- 不依靠警察保护，使我们免受法西斯分子的迫害。享有反对法西斯和三 K 党的自卫权。根据力量关系决定具体战术，对抗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我们内部阶层中实行一定程度的自律。不应将人民带入冒险主义境地，导致战斗失败。
- 统一行动，反对保守派。伤其一，便害及全部。

组织结构及原则

“激进派妇女”是一个严肃、民主和结构完整的组织。

我们在面对压迫时必须团结一致；在倡导女性解放时必须有积极的计划；必须相信妇女领导地位的必要性；我们还相信，女性解放对于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世界的整体运动起着决定作用。我们的内部结构正是所有这些信念的直接结果。

为了存在、存活、受到重视，妇女运动必须发挥个人自由和团体集合功能之间积极互动的作用。我们有必要确保在所倡导的运动中实现完全的民主权利，保持组织行动的纪律性。我们认为民主与组织之间不是相悖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关系。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机构是成员享有最高决策权的组织。虽然观点独立不一的个体，他们的联合体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组织成员可以用多数表决机制来表达意见，从而对团体的统一政策作出决定。然而，若没有对争议问题事先进行自由、公开和集中讨论，表决机制是毫无意义的。仅在成员会议全面公开讨论时才能进行投票决策。

任何问题的少数意见持有者都有权获得充分的尊重，有权要求他人对其处境进行充分考察。并且如果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对整个组织是必要和有建设意义的话，则可以要求重新对该问题进行评议。

行动中的整体合一只有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借助双重组织生活（内部和外部）的方式才能实现。职位应通过内部讨论逐步建立且对争议问题的讨论不能公开进行。少数意见不能代表组织的政策。在公众场合，成员必须一致表达组织的多数意见，否则“激进派妇女”就会被误会、曲解，从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权利。当然成员有权对“激进派妇女”计划之外的问题自由地表达个人意见。这种组织内的一致行动和彻底的民主被称为民主集中制。

领袖在民主进程中是一个必要和关键的部分。“激进派妇女”鼓励所有成员成为领袖。每个成员应当为确保计划正确连贯地执行而担负起个人职责。个人对本组织的每一方面：从理论和计划问题直至行政细节，进行考察和分析，成为真正意义上集体领导制的基础。

相互帮助和集体援助是我们的最高道德标准。如果我们希望清晰地展示我们的身份和目的，合作和良好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基调和方式贯穿内部讨论、分歧、争议的全过程，且可被最佳描述为“同志般的”关系。

我们在工作中争取民主、理性和客观。适度的纪律是基于相互尊重且建立在有意愿对我们的计划和组织结构的各个方面进行尝试、革新和重新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视自己为不断变更的社会秩序中的发展力量，并且试图将规则的必要性与之适应于变更的境况相联系。在决策中完全民主，在处理组织事务中完全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组织规范和标准。

“激进派妇女”是一个妇女的自治组织。我们的计划是号召所有女性和男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取得团结的策略是建立一个妇女可以单独集会的场所，推举自己的领袖或互为领导，并且与其它受压迫人民的运动相联系，获得有力的地位，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自治不是分裂主义。分裂主义是将分裂提升到一个原则高度，并且将之作为反对歧视的政治解决方式。

因为“激进派妇女”和“自由社会主义党”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原则以及有色妇女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必要性上观点一致，因此这两个组织之间有着志同道合的正式合作关系。两者相互联系并在许多领域内共同合作。我们自豪地保卫着这样的联盟关系。“激进派妇女”感谢来自“自由社会主义党”成员的带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是“激进派妇女”的创始人。

组织规章

成员

基本同意组织的理论、计划和结构是成为成员的条件。预备成员应向全国或全世界范围内召开的组织大会申请将其名字提交大会投票，或向其申请的分支机构递交成员申请。

每名成员都应当积极参与组织工作并将其政治理想融入生活。

领袖

成员选举产生领袖，领袖响应全体成员的要求并对之负责。领袖由全体成员更换，并被赋予足够的权力以便在成员会议休会期间有效地履行职责。

全国执行委员会

全国执行委员会（“NEC”）为“激进派妇女”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该机构负责为本组织及其各分支机构的发展方向提供政治导向和分析。

首先，NEC 负责监督“激进派妇女”大会决策的执行情况。其次，NEC 是政策制定机构，有权在大会休会期间制定全国性政策及其实施细则。

“全国性组织者”及其他会员接受 NEC 的指令，澄清、协助、实施及执行政策。

“全国性组织者”和“全国导向委员会”由 NEC 成员组成，驻在“全国办事处”所在的城市，是 NEC 在全体会议休会期间的政策制定者并对 NEC 负责。同样，NEC 向“激进派妇女”全体成员负责。

NEC 由全体成员在全国性或世界性大会上选举产生。由大会选举出来的提名委员会提议候选人名单以备讨论、修改和选举。提名委员会主要由普通成员组成，包括各“激进派妇女”分支机构的成员代表；他们应当反映不同成员构成，例如年龄、种族、性取向和新老成员。进行不记名投票选举。

全国性官员

“全国性组织者”负责一切涉及全国性计划、政策、行政及大会休会期间以及 NEC 休会期间的组织事宜。这包括全国范围内的联络、发布讨论公告、组织全国性招聘、为分支机构组织者和在分支机构所在地以外的成员提供协助及所有相关功能。全国性组织者主持 NEC 会议并准备 NEC 会议议程。全国性组织者由组织大会全体成员选举产生。

依据组织的需要和所拥有的资源，每个协调员被赋予以下职责，他们被分配给“全国性组织者”，或将这些职责委派给 NEC 会员。

财务协调员负责全国资金的银行和会计事务；登记和收集全国会费、担保金、捐款及其他来自分支机构的收入；列支和支付；准备月度报告；向 NEC、全体成员及大会提供财务状况建议、提出组织需要，并提供如何达到上述要求的建议。

出版协调员负责协调“激进派妇女”文件的起草和编辑，并与“全国办公室”在文件的版式、设计、复制、翻译及全国发行工作上进行合作。

教育协调员负责协调“激进派妇女”与分支机构组织者、教育官员和在分支机构所在地以外的成员之间的教育计划；实施“激进派妇女”大会和 NEC 通过的教育重点决策；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教育资料。

其余常任委员或临时性职位将视需要由 NEC 任命。

分支机构执行委员会

每个分支机构的执行委员会都由一名主席和一定数目的委员组织，总体大小由组织的当前需要决定。执行委员会应包括经验丰富的激进派妇女领袖以及新兴的、不断培养起来的领袖。

执行委员会是分支机构的自觉集体领导。它针对当地方针、政策、策略、教育情况和行动向全体成员提出建议。相反，它也考虑全体成员提供的所有建议。执行委员会是成员大会休会期间的负责机构，它与分支机构组织者紧密合作，实施成员决策。

执行委员会由全体成员多数投票选举产生。提名委员会由即将离职的执行委员会提议且由成员全体投票选出。提名委员会制订执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新的名单在选举前两周递交全体成员。提名名单的书面通知以及选举权必须在选举会议召开前一周发给所有成员。额外提名可以由全体成员作出。投票应为无记名。

分支机构执行官员

每一个“激进派妇女”分支机构至少需要一个组织者。以下规定的额外职责范围为单个执行官员的工作职责，由组织者履行或分派给其他成员来执行。根据每一个分支机构的大小、资源及具体需要决定任务的不同组织方式。其它工作机构可以由分支机构全体成员在任何必要时候创建。

组织者为机构的主要发言人、代表、协调者和行政官。在行政委员会闭会期间，组织者对其它执行官员在行政及政策问题上享有对所出现的问题的最终决定权。她必须审批带有公众性质的一切行动，并对全体成员大会及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一切涉及政策性的问题进行审批。组织者是行政委员会闭会期间的负责人。

财务董事负责整个机构资金的银行及会计事务；登记列出费用、抵押、捐赠及其它收入项目；为地方分支机构的财务状态准备定期报告；定期向全国财务协调员缴纳“全国激进派妇女”该分支机构的会费。财务总监提议并协调地方资金的运转。

成员董事向有意参加“激进派妇女”的妇女提供入会程序及要求信息。该董事负责接待每个参加会议的新成员并进行事后联络。该董事保存一份当时所有成员的邮箱及电话清单并定期分发给全体成员。该董事协调地区邮件寄送。

公共关系协调员负责“激进派妇女”与新闻媒体间的协调。公共关系协调员起草、复制、颁发会议及特别事件的新闻稿，并在特别新闻稿及新闻发布会上协调或提供建议。

特别活动协调员提议举行常规公共事务并紧密联系组织会议或社会活动的成员。该协调员为组织的基础要件提供信息、援助和咨询，编制工作描述及近期特别活动时间表。

教育董事负责规划“激进派妇女”的教育计划并进行指导，视情况需要负责协调各教育专员

参加会议、制定个人阅读计划、组织学习小组、学习班及讲座，并协调制作和发放上述活动的宣传单。

记录秘书负责保存成员大会及执行委员会各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上述资料记录组织机构的日程安排、提案及决议。记录秘书必须将会议纪要按有序和易于读取方式保存，使之便于执行官员及成员翻阅；并且向其它分支机构和全国组织者分发复本。

“自由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联络员负责在“自由社会主义党”的执行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或活动事项上与“激进派妇女”执行委员会进行沟通，反之，与“自由社会主义党”执行委员会就上述事项上进行沟通，便于两个组织更好地合作。

特别职位及特别委员会

特别任务及特别委员会可以建立并从组织者、执行委员会和全体成员中选任成员。若成员从组织者或执行委员会中选出，则该任命必须由全体成员审核通过。

任期及年度评审

分支机构领导的任期由全体成员在年度评审会中确定，在该年度评审会中还应评估过去一年的工作并设定今后阶段的目标。

全国执行官员在每次大会上选举产生。

地区性或全国性/国际性全体成员可以自由决定安排特别研讨会、大会及其他会议上讨论公开或内部议题。

财政

常规、可靠的财政措施对合理计划活动，实施决策及公开发布我们的主张很有必要。

伍元（美元）入门费缴纳给招募新成员的分支机构。每月会费为 10 元（低收入成员可缴纳 5 元）。除非与财政董事达成困境安排协议，连续三个月未缴纳会费视为退出“激进派妇女”。除了缴纳会费，成员还需要缴纳每月保证金以维持分支机构资金库存，该保证金额可以与财政董事协商确定。

分支机构全部会费的百分之八十上缴全国办公室。分支机构与全国激进派妇女协商一致，将月保证金的部分缴给全国办公室。

全体成员可以自行决定为某一特殊目的征收特别保证金和估价金额。

出版物

“激进派妇女组织立场书”——“激进派妇女”的公开组织立场书必须由全国性成员大会多数票通过。

“内部通告”：目的是在“激进派妇女”内部激发各类意见的书面交流，并为组织内与新政纲相关立场的自主开发机制提供平台。内部通告同时也作为会议预备讨论材料的主要发布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激发会议的商议情况。

所有“激进派妇女”成员可以且应当向通告投稿，该通告将在每次全国会议召开前出版，出版次数视会议闭会期间累积的材料状况而定，目标为每年至少刊出二期通告。

核心领导团体

任何一名“激进派妇女”核心机构的成员都有权组成核心领导团体，在任何一个被压迫群体中推动组织目标的实现。

“有色同志核心团体”由“激进派妇女”及“自由社会主义党”中所有有色成员组成。该团体最初于1981年在西雅图成立。此前，“激进派妇女”在有色妇女先锋作用上的立场受到一小群毫无原则性的人的攻击，并企图破坏我们与“自由社会主义党”之间的联盟。地方上的有色同志带头打退了这小群人的攻击，并决定今后建立核心团体，以正式形成他们的新领导层及合作力量。

自此以后，核心团体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即全国有色同志核心团体（“NCCC”）。在这个团体内，有色同志们组织起来独立讨论他们的共同问题并培养他们的领导技能。NCCC为“激进派妇女”和“自由社会主义党”提供领导力量，尤其是在有色人群及反对种族歧视等问题上。该团体提供政策性提议，在我们介入有色人群运动中充当先锋，并在一切种族问题领域内为我们的组织提供建议。

纪律

作为一个致力于妇女解放的组织和切实可行的女权运动，我们组织的运作效率取决于组织内部对民主坚持不懈的谨守及在公众面前的团结。成员对组织原则的违反，如违背在运动中相互协助、集体帮助和团结一致的原则，都会对组织的士气、严肃性和稳定性造成威胁。单个成员武断或破坏性的行动或误述组织的政策，将会被正式要求停止此类行为，与此同时该名成员也将被告知理由。若某名成员仍坚持破坏组织的团结性，全体成员有权保护组织，以多数投票通过要求其离开组织。

道德规范及共同义务

“激进派妇女”建立在妇女激进派所持有的“伤及一人，害及全部”的理念之上，也建立在基于组织性力量支持的团结一致的行动之上。这将促进我们的事业对激进派妇女运动及广大群众的推动作用。

这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都相互负有尊重、忠诚、理解及帮助的义务，在生活的每一层面协同及单独与男权至上、种族主义、异性恋主义及阶级压迫进行对抗。这使我们更有责任着力于创造和实施有效、功能性的抵抗策略，对我们的角色和权利进行教育和扩展。我们的目的并非互相同情，而是藉着有意义的问题成为推动我们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基础。

变理想为现实

我们坚信，拥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和贴切可行的计划纲要，团结在共同的目标及相互依赖、共同行动的原则高度之下，妇女可以领导且已经开始领导打破资本主义堡垒压迫的行动，建立一个崭新的、真正意义上平等和自由的社会。走向胜利！

注释

- 1、恩格斯：家庭的起源，私有财产与国家：论摩根的研究（纽约：国际出版人，1972）“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 2、路易斯·H·摩根：“远古社会”（纽约：亨利·霍特公司，1878）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 1878)
- 3、艾弗林·利德：《女性解放：从母系氏族到父系家庭》（纽约：寻路者出版社，1974）第 128 页 Evelyn Reed: “Women’s Evolution: From Matriarchal Clan to Patriarchal Family”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4)。
- 4、同上注，第 127 页。
- 5、恩格斯，第 120 页。
- 6、同上注，第 72 页。
- 7、同上注，第 72 页。
- 8、同上注，第 232 页。
- 9、同上注，第 121 页。
- 10、同上注，第 137 页。
- 11、同上注，第 137 页。
- 12、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数据摘要：1999（第 119 版）》（华盛顿，1999）72 章：第 61 页；661 章：第 418 页（Washington, DC, 1999），。
- 13、恩格斯，第 135 页。
- 14、卡尔·马克思：《资本：政治经济学批评》，第 1 卷：“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芝加哥：查尔斯·科尔公司，1906）Chicago: Charles H. Kerr Co., 1906）第 536 页。
- 15、恩格斯，第 137—138 页。
- 16、史太萍·菲池 Stepin Fetchit 是非裔美国歌舞杂技表演家及演员林肯·派瑞 Lincoln Perry（1902-1985）的艺名。虽然他在 49 部电影中出演，但是他所饰演的黑人角色成为黑人形象笨拙、谄媚、头脑简单的缩影。

17、舒拉米·法尔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性辩证学：女性革命》(纽约：班潭书局, 1971)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1)

18、拉莫纳·班尼特 Ramona Bennett (1938-) 是一位美国土著居民后代的倡导者。1976年, 她作为普亚勒普(Puyallup)部落的族长率领一队武装力量, 七天内占领了卡斯卡底古陆 Cascadia 青年中心, 从华盛顿州将该建筑夺回。

戴茜·宾迪 Daisy Bindi (1904-1962),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曾协助领导 1946 年土著(农场) 州劳工的划时代的罢工。她建立了一所土著学校及西澳洲第一间土著合作所。

塔尼亚(海蒂·塔马拉)本克 Tania (Haydee Tamara) Bunke (1933-1967), 是一名犹太裔德籍阿根廷共产党员。受到席卷拉美的革命浪潮的影响, 加入了车古法拉 Che Guevara 游击部队, 在玻利维亚军队所设的埋伏中阵亡。

丁玲 Ding Ling (1904-1986), 中国革命家、小说家及性别歧视公开批评家。因其女权主义主张, 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被国民党监禁, 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受斯大林影响的共产党监禁。

魏玛·艾斯平 Vilma Espin (1930-)于 1952 年以学生身份参加古巴解放运动并在“反抗部队”中作战, 于 1959 年取得胜利。她是“古巴妇女联盟”主席及古巴共产党领袖之一。

伊丽莎白·葛丽·孚伶 Elizabeth Gurley Flynn(1890-1964)在乔·希尔 Joe Hill 的歌曲“反抗的女孩”中受到赞扬。她为“世界工业工人(IWW)”的街头演说家, 且为言论自由并为美国东西海岸的移民劳工权利的倡导者, 后来加入美国共产党。

克拉拉·弗雷瑟 Clara Fraser (1923-1998)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犹太裔革命家, 极富天分的组织者和美国马克思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她是一名预见性理论家, 且为“激进派妇女”和“自由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

艾玛·勾德曼 Emma Goldman (1869-1940), 美国的俄罗斯犹太裔移民, 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论、劳工权利、自由恋爱、生育控制以及同性恋权利的煽动家。

范尼·楼·汉墨 Fannie Lou Hamer (1917-1977) 于 47 岁时因试图投票选举而失去佃农的工作之后, 成为一名鼓舞民心的民权运动领袖。她是“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副主席。

劳瑞·汉斯贝瑞 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 享誉的非裔美国剧作家、散文家和活动家, 她将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与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和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为女同性恋先锋团体“比丽提斯的女儿”(Daughters of Bilitis) 早期成员。

姆瑞尔·黑格尼 Muriel Heagney (1885-1974)领导了澳大利亚工人争取温饱工资、同工同酬、生育假期及家政工人的工会集体合同等运动。

秋瑾 Jiu (Qiu) Jin (1875-1907) 勇敢地反抗伪满洲国的统治、殖民主义以及反对妇女在中国和日本的附属地位。她成立了中国妇女革命者联合会并因图谋颠覆政府的罪名被处死。

海伦·凯勒 Helen Keller (1880-1968)在 19 个月时失明、失聪，大学毕业，后成为倡导残疾人、妇女投票权、劳动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知名的激进推动者。

尤里 Yuri Kochiyama (1921-), 为日裔美国社会组织者，在黑人自由斗争中成为激进分子。矢志不渝地为亚裔美国人、政治犯、波多黎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权利奔波的活动家。

洛丽塔·勒宝隆 Lolita Lebron (1919-)领导了 1954 年对美国参议院的武装攻击，使世界注目于波多黎各殖民主义的状况。在狱中度过 25 年，仍不懈为波多黎各的自由而伸张。

罗萨·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波兰人，犹太裔、残疾，是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为德国共产党和斯巴达团体的创始人，她在协助领导一次德国起义失败后被暗杀。

康斯坦斯·马可依维斯 Constance Markievicz (1868-1927)，爱尔兰自由的改革者，1916 年复活节起义军事特遣队副指挥。爱尔兰的新芬党成员，第一位被选入英国议会的女性。

葛洛丽亚·马丁 Gloria Martin (1919-1995) 具有活跃、不羁的个性，为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和的早期民权活动家，社会组织者和女性革命家。“激进派妇女”的创始人及“自由社会主义党”的指路明灯。

伊丽娜·马克思 Eleanor Marx (1855-1898) 全心全意的革命家，马克思幼女。被誉为英格兰最棒的演说家，亦是一名作家、罢工领袖、女工的维权者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圈内的重要角色。

詹尼特·麦柯克劳德 Janet McCloud (1934-), 图莱利普 Tulalip 部落的成员，争取西北太平洋地区印第安人渔业权及主权运动的先锋领袖，亦是一名土著妇女及当地人自由问题的国际演说家。

路易萨·摩里诺 Luisa Moreno (1907-1990?), 出生于危地马拉，从事三十年的工会组织及倡导美国拉丁美洲人维权运动。于 1950 年被驱逐出美国，居住在墨西哥、古巴和危地马拉。

塞尔维亚·潘克赫斯特 Sylvia Pankhurst (1882-1960) 在大不列颠的投票权运动中忍受了监狱及饥饿罢工的考验。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对者，她在狱中用了五个月时间发动反政府的支持“俄罗斯革命”的运动。

罗萨·帕克斯 Rosa Parks (1913-) 因拒绝给一名白人让座而引发 1955 年蒙哥马利、阿拉巴马公交车联合抵制运动及黑人民权运动。她是一名裁缝师，为当地的 NAACP 秘书。

露西·冈萨雷斯·帕森斯 Lucy Gonzales Parsons (1853-1942)，黑人，住在美国的墨西哥女革命家，为妇女、劳工、穷人及有色人群的活跃的演说家和推动者。她丈夫为伊利诺州处死的“干草市场烈士”之一。

纳瓦尔·萨达维 Nawal El Saadawi (1931-), 埃及物理学家、从事描写阿拉伯妇女、性、宗教和政治的战斗作家。她的书籍在埃及被禁，且因指责政府在 1980-82 期间入狱。

杰希·史翠特 Jessie Street (1889-1970) 因大胆宣扬女权主义、社会改革并加入劳工党而使澳大利亚上层社会震惊。她致力于宣扬土著居民的宪法权利的运动。

艾玛·特纳尤卡 Emma Tenayuca (1916-1999) 在 22 岁时领导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城 12,000 名墨西哥裔美国人“山核桃剥壳者”罢工。随后一年，她成为德克萨斯州共产党领袖。

索加尼·楚斯 Sojourner Truth (c.1797-1883) 一名出生于纽约州的奴隶，积极为内战后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废奴运动、投票权和经济进步及促进黑人妇女等方面进行游说的演说家和组织家。

克拉拉·切金 Clara Zetkin (1857-1933) 在担任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局秘书时发起建立“国际妇女节”。她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后为德国共产党的领袖。

19、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数据摘要：1999（第 119 版）》（华盛顿，1999），235 章：第 151 页。

联系方式/出处说明

激进派妇女全国总部/Radical Women

New Valencia Hall

747 Polk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USA

电子邮件: radicalwomens@gmail.com

网址: www.radicalwomen.org

电话: (415) 864-1278 • 传真: (415) 864-0778

激进派妇女出版部/Radical Women Publications:

5018 Rainier Avenue South

Seattle, WA 98118, USA

电子邮件: rwseattle@mindspring.com

电话: (206) 722-6057 • 传真: (206) 723-7691

1967 年英文第 1 版由华盛顿州西雅图激进派妇女发行

2001 年英文修订版

© 2001 年激进派妇女版权所有

2001 年英文版《宣言》于 1990 年 2 月 17 至 20 日在美国加州圣莫尼卡举行的激进派妇女 23 周年成立大会上经全体成员批准通过。

只要注明出处，允许自由引用《激进派妇女宣言》。

翻译：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时丽娜

校对：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张萌亮

编辑助理：美国西雅图激进派妇女成员玛丽安·柯蒂斯（Mary Ann Curtis）